

分类号 _____

密级 _____

U D C _____

编号 10736 _____

西北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革命与保守：洪秀全矛盾政治人格
的心理传记研究

研究生姓名： _____ 刘冠楠 _____

导师姓名职称： _____ 杨玲 教授 _____

专业名称： _____ 应用心理学 _____

研究方向： _____ 人格与心理健康 _____

二〇一五年三月

M. D. Thesis

**Revolutionary and Conservative:
Psychobiography Study of Hong Xiuquan 's
Contradictory Political Personality**

Liu GuanNan

School of Psych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March, 2015

郑重声明

本人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撰写并完成的，学位论文没有剽窃、抄袭、造假等违反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侵权行为，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特此郑重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用宋体四号字）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书

本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管理办法及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接受社会监督。本人授权西北师范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学校有关数据库和收录到《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信息服务，也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或汇编本学位论文。

本论文提交当年/一年/两年/三年以后，同意发布。

若不选填则视为一年以后同意发布。

注：保密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于本授权书。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年 月 日

西北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信息

论文题目	革命与保守：洪秀全矛盾人格的心理传记研究		
姓 名	刘 冠 楠	学 号	2012210396
专业名称	应用心理学	答辩日期	2015年5月
联系电话	18109460707	E_mail	598039037@qq.com
通信地址(邮编)：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730070）			
备注：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引言.....	1
1 文献综述.....	3
1.1 政治人格的定义和特点.....	3
1.2 政治人格的主要研究方法——心理传记法.....	5
1.3 政治人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5
1.3.1 国外研究现状.....	7
1.3.2 国内研究现状.....	8
1.3.3 国内外研究不足.....	8
1.4 洪秀全政治人格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8
1.4.1 洪秀全政治人格的研究现状.....	8
1.4.2 洪秀全政治人格研究的不足.....	9
2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11
2.1 问题提出.....	11
2.2 研究意义.....	11
3 研究构想.....	13
3.1 研究目的.....	13
3.2 研究框架.....	13
4 研究一：洪秀全的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影响.....	14
4.1 洪秀全矛盾人格初探.....	14
4.2 相关概念界定.....	15
4.3 验证洪秀全的矛盾人格特征.....	16
4.3.1 研究方法——特尔菲法.....	16
4.3.2 材料.....	16
4.3.3 评定结果.....	16
4.4 洪秀全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影响.....	17
4.4.1 第一阶段.....	17
4.4.2 第二阶段.....	19

4.4.3 第三阶段.....	21
4.5 小结	24
5 研究二 洪秀全矛盾人格成因的心理动力	25
5.1 宗教思想——自我的调节作用	25
5.2 生活风格——对生理需要的过分追求.....	30
5.3 妇女政策——恋母情结	34
5.4 政权建设——合作的变化.....	40
5.5 小结	45
6 研究三：洪秀全矛盾人格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	46
6.1 代际影响	46
6.2 家庭影响	47
6.3 重要他人	49
6.4 环境影响	50
6.5 小结	51
7 总结.....	52
8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55
英文参考文献.....	IV
中文参考文献.....	VI
附录.....	XII

摘要

政治人格作为政治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一直受到各界学者的关注。政治人格是在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构成了外在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系统，它决定或影响行为主体的政治选择和行为趋向。政治人格研究多数是以那些极大地推进或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领导者或英雄人物为主的个案研究。本研究选取了给晚清和近现代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为研究对象。作为太平天国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洪秀全，其在整个运动中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既有新形势下进步性的特点，同时又有传统农民起义领袖的保守性特点，这种革命性与保守性同时存在的矛盾政治人格必然会对整个太平天国运动产生重大的影响。

本研究首先运用质量相结合的心理传记法，在人格形容词量表的基础上，对15名近代史研究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博士生进行特尔菲法调查，验证洪秀全的矛盾政治人格特征，然后再分析其矛盾政治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最后，再结合史料并通过心理传记法，分析其矛盾人格形成的心理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1) 洪秀全的矛盾政治人格表现为革命性和保守性。革命性主要表现为上进性、反抗性和好胜性；保守性表现为迷信性、腐败性和奢侈性。他的革命性政治人格促进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成功，保守性政治人格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2) 洪秀全早期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来的矛盾其实质是来自于自我的调节，为了减少个体的焦虑，他后期宗教的选择则是为了满足统治的需要；在生活方式、妇女政策和政权建设方面的矛盾性主要是因为他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的缺失，对这些需要的过分追求造成了他革命和保守的矛盾人格。

(3) 洪秀全矛盾政治人格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代际、家庭、重要他人和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洪秀全 政治人格 革命性 保守性 心理传记 需要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in research object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Political Personality ha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ll the time. Political Personalities are series of ment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developed gradually under the dual effects of genetic and environment, the internal power system of external political behavior is composed by th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lso influence or decide people's political choice and the trend of behavior. case study that contain leaders or heroes who usually promote or hinde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t that time is the main form in most of political personality research. this study select Hong Xiuqu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o as a .peasant uprising leader had brought enormous influences to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modern society. as one of the main leader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Hong Xiuquan's political behavior not only exhibited a progressive trait under the new society situation, but also showed a conservatism trait which common in the traditional peasant uprising leader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radoxical political personality which revolutionary and conservative both have is bound to hav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 whol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First, on the basis of Personality Adjective scale and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with Delphi method from 15 doctoral students in modern history, this study applies the method of psychobiography which combining quality and quantity verified the contradiction of Hong Xiuquan politic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then analysis his influence 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caused by his contradiction political personality. finally, use the method of psychobiograph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find out the psychological motive and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s contradiction personal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

(1) Hong Xiuquan's paradoxical political personality contains both revolutionary and conservative, revolutionary mainly exhibited as progressive, rebellious, emulative and conservative showed as superstitious, corrupt, luxurious. his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personality promoted the success of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while Conservative political personality led to the failure of it.

(2) Hong Xiuquan's contradiction of religious belief in the early time is a kind of self-adjustment to reduce the individual anxiety in fact .He later religious choice is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ule. the contradictions in women's policy, regime construction and style of life mainly because of his lack of physiological needs, security needs and respect needs, his excessively pursuit for these needs lead to his paradoxical personality that consist of revolutionary and conservative.

(3) The extern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ng Xiuquan's paradoxical political personality mainly contains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important person and circumstances.

Key words: Hong Xiuquan, political personality, revolutionary, conservative, Psychobiography, needs

引言

政治心理学正式形成于 20 世纪初期，它结合了心理学和政治学，是一门研究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相互作用规律的交叉学科(Monroe, 2002)。正是这样一门交叉学科引起了全世界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精神病分析学家、精神病理学、以及政治界的密切关注和研究热情(刘松杨, 刘峰, 1991)。由于政治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并且从事研究的人员也各不相同, 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态度、注重的对象方面都各不相同。美国政治学家多伊奇(Morton Deutsch, 1984)认为“政治心理学所研究的是政治过程和心理过程的相互影响, 这是一种有双向作用的相互影响。正如认识能力限制和影响政治决策的性质一样, 政治决策的结构和过程也影响认知能力。”他所说的心理系统既包括个体的心理系统又包括群体的心理系统, 在注重政治人、政治领袖对政治活动的影响时, 也非常重视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对个体、群体心理结构的影响(刘松杨, 刘峰, 1991)。美国缅因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斯通(William F. Stone), 认为“政治心理学研究的是这个政治活动中个性的决定因素, 它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个人的心理因素对政治活动家的影响, 如态度、理智、兴趣等心理因素; 二是指环境对政治人的影响, 如政治事件的影响, 长期所处的政治系统的影响等等。”(刘松杨, 刘峰, 1991)斯通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重点放在个人角色上, 更重视个体心理系统对政治系统的影响(斯通, 1987)。由此可看出, 心理学家更重视个体的心理特征对政治系统的影响, 而政治学家则更重视政治活动和个体、群体心理结构之间的相互影响。无论是心理学家还是政治学家都将个体与政治活动之间的相互影响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个体与政治活动的相互作用关系中, 个体的人格特征尤其受到了政治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柏拉图认为人格和政体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人格作用于政体, 政体又反作用于人格。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Harold D. Lasswell)在创立政治心理学之初就认为, 存在一种基本的政治人格, 它以强烈的权力冲动为特征, 吸引着政治人参与到政治活动中。随后, 拉斯韦尔通过对临床案例和政治领袖的分析, 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人格理论: 政治人格源自于私人问题转移到公共话题的心理自居作用(魏万磊, 2011)。他将政治人格作为政治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沿着拉斯韦尔开创的道路, 关于政治人格研究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多数是以领导者或是极大地推进或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英雄人物为主的个案研究, 如对毛泽东(桑国宽, 1998)、屈原(黄颂, 严正明, 1997)、拿破仑

(Falk, 2007)、希特勒(Langer, 1972)等的政治人格的研究。这些人物都是历史的伟人，他们都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

本研究选择了给晚清和近现代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的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并以他的政治人格为研究对象。首先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无论在规模方面还是在发展高度上都被誉为中外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世界上最大的” (丹涅特, 1959)农民革命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在世界农民战争史上的地位，可以媲美与公元前 73-71 年的斯巴达克的奴隶武装起义，而它的主要领导人洪秀全则是在世界革命上的地位同斯巴达克、罗伯斯比尔等齐名的最杰出的革命领导者(牟安世, 1979)。其次，太平天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给清王朝的统治以沉重打击，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平等平均”思想的农民运动。洪秀全被毛泽东评价为“先进的中国人”(毛泽东, 1991)，他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他的成就是伟大的，但他领导的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最终还是走向了失败。他的失败最终被归结于革命的不彻底性。他反对清王朝的压迫统治，提出了平等和平均的进步思想，而自己却以帝王自居，又制定了一套森严的等级制度；他提倡一夫一妻制度，而自己又妻妾成群；他反对一切迷信行为，而自己却过分迷信于天父皇上帝。显然他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这种矛盾政治行为的背后必然有着矛盾的政治人格特征。洪秀全作为这场政治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政治人格特征对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洪秀全的矛盾政治人格具体是什么，对其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又是什么，其矛盾人格背后的心理动力和影响因素又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拟采用心理传记法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1 文献综述

1.1 政治人格的定义和特点

政治行为者以自己独特的人格特征对政治活动产生影响。在本研究中所讲的人格皆指政治人格。关于政治人格的界定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郭周卿, 2013): 第一种观点认为政治人格就是人格与政治的结合, 是政治化的人格;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人格的实质就是个体的一系列心理特征的综合, 此观点重点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构成”; 第三种观点认为政治人格是一种具体的政治文化特质, 是政治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固化和凝聚(龚蓉蓉, 2006)。由于政治心理学受到了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各学科的关注, 因此关于政治人格定义也各有侧重。在本研究中, 关于政治人的研究重点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构成, 因此本研究对政治人格的研究归属于第二种观点。在此采用王慧然对政治人格的定义, 即政治人格是指在遗传和环境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系列心理特征, 这些心理特征构成了外在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力系统(王慧然, 2001), 它是决定或影响着行为主体的政治选择和行为趋向的内在动力(葛荃, 2008)。

本研究属于心理学中人格研究的范畴。政治人格是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 它包括个体独立意识、参政意识和政治技能(蒋云根, 2002)。那么它除了具有人格所特有的属性: 独特性、统合性、功能性和稳定性之外, 还有一些独特的特征(展明峰, 陈勇, 2004): 第一, 系统性, 政治人格它既是人格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又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结构, 它包括政治主体意识、参政意识和政治技能; 第二, 过程性, 政治人格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从萌芽开始, 然后到形成和发展, 最后达到成熟和完善; 第三, 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里, 政治人格的价值和方向取决于阶级性, 阶级性是政治人格的基本属性; 第四, 社会性, 个体的政治人格塑造离不开社会环境, 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性质的制约。由此可知, 政治人格取决于个体的阶级属性, 它的形成受社会环境和个体政治意识的影响, 最终作用于个体的政治行为。例如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 他们的政治人格虽然有进步的一面, 但是受到阶级属性的影响, 又有很大的局限性, 并且这一局限性又影响到了他们的政治行为。

1.2 政治人格的主要研究方法——心理传记法

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起初主要是采用精神分析法, 分析政治行为者的内驱

力,但也有一些从认知、情感、行为主义乃至人本主义的心理学视角对政治人格做解释的(魏万磊, 2011)。然而随着心理传记法的发展,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其逐渐成为对政治人格研究的一个主要方法。在对个体生活史考察的基础上,对个体的动力做出精神分析的解释或是其他方面的解释。当前,心理传记包含着精神分析法,还受行为主义、人本主义等的影响,避免了单一的精神分析;并且这种方法还将个体的一生作为一个研究背景,避免了根据几个或多个生活事件对其人格研究的片面性,有助于对个体人格特征做更全面、更深刻的解释和分析。

心理传记开始于 1910 年弗洛伊德的《达·芬奇对童年记忆的回忆》,该项研究通过分析达·芬奇的油画作品,来探讨他的童年经历对其成长和作品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他的心理和情感的发展 (Elms, 1988)。Friedlander 把心理传记定义为心理分析理论或概念在传记学上的运用(Friedlander, 1978), McAdams 和 Ochberg 又将心理传记定义为系统地运用心理学理论,将个人生命转换成一个连贯且具启发性的故事(McAdams& Ochberg, 1999)。朗彦认为,心理传记的界定不只是将人格理论应用在传记,同时也包括心理学理论的任何分支概念、资料及方法应用于传记学。虽然到目前关于心理传记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就是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跟个体相关的文本材料等相关资料,并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因素,深度分析个体的心理现象及人格特征的研究方法(魏冉, 2012)。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心理传记定义为:系统地将心理学概念、原理和理论应用于个体的生命历程研究,对个体的心理现象及人格特征作心理学解释的研究方法。总体来说,心理传记对个人生命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综合的方法,是以个人的成长史为基础和出发点,将个体的一生作为一个整体。其收集资料不是为了去解决一个前置性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些资料具有很大的价值,并且还具有很大的历史学和心理学意义(Fouché & van Niekerk, 2010)。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有助于研究者对被试的心理现象和人格特征进行全面的、整体的和深入的研究。

心理传记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经历了由纯质性研究到质量结合的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也使关于人格的研究更加科学和严谨。心理传记法成立初期,采用的是纯质性研究。将研究过程分为五个阶段(周宁, 刘将, 2008): 第一,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传主; 第二,运用已出版的资料,了解传主; 第三,收集未出版的资料; 第四,可以造访相关人士; 第五,撰写心理传记,并对个体一生的事件作心理学解释和预测。尽管这种质性研究有自然性、整体性、归纳性、描述性、解释性的优

点(戴斌荣, 2005), 但是还是受到了科学实证主义的质疑。传统的心理学研究以实验心理学即量化研究为主, 通过操作化的定义, 借助数学工具而实现的研究(单志艳, 孟庆茂, 2004)。无论是质性还是量化研究都有着各自的优点和缺点, 因此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些关于质性研究和量化研究结合问题的探讨(戴斌荣, 2005)。人的心理现象是一个多层次的、多元化的复杂结构, 既有客观的、可量化的部分, 也有主观的、不可量化的部分, 因此质量结合的研究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趋势。在这种趋势下, 量化研究也被引入到了心理传记研究中。国内学者郑剑虹于 1997 年首次将质量相结合的心理传记法应用到对梁漱溟人格的研究中(舒跃育, 2010)。其基本思路是先选择传主; 然后根据可靠史料编写传记, 让若干被试阅读所编写的传记后对传主通过人格形容词量表(也可以是其他的量表)进行人格评定; 将人格形容词数据输入电脑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分析出传主的人格成分; 然后根据心理学理论和知识以及传主的生活史, 解释和分析其人格形成的原因及其历史行为表现, 并验证心理学理论, 或对原来理论中不能解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假设。进入 21 世纪之后, 质量相结合的心理传记法也不仅局限于人格形容词的评定法。在随后的研究中, 在人格形容词评定法的基础上, 又引入了 Q 分类法、多维尺度法、特尔菲法等(吴继霞, 冷洁, 2014)。如对关于蔡元培(孙菁, 吴继霞, 2013)、马寅初(Wu & Cao, 2011)的人格特质的研究就是在人格形容词量表的基础上采用多维尺度法进行的分析; 关于唐文治(吴继霞, 曹莉萍, 朱浚溢, 2012)人格特征的研究是在人格形容词量表的基础上采用特尔菲法进行的分析。

心理传记法在人格特征研究方面不断进行着完善和扩大, 但是迄今为止, 对于政治人格的研究依然采用的是传统的心理传记法。将这种新的质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应用到政治人格的研究也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1.3 政治人格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开始较早, 自 20 世纪 20 年代政治心理学形成之后, 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就已经开始了。政治心理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魏万磊, 2011)最先对政治人格进行了研究, 他试图用精神病理学的临床资料和政治学的相关文献来证明人格是否能塑造个人的政治信念, 是否对个人的政治行为其决定性作

用。由于他忽略了环境的影响，过分夸大了人格对政治的影响，而没有得到公众的有效认可。但正是从拉斯韦尔开始，美国的政治学界开始关注政治行为中的心理因素，他为政治人格的研究开创了道路。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政治人格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是关于政治人格的群体研究。

关于政治人格的个案研究是以政治领袖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心理传记法为主。他们研究了政治领袖的个性特征、领导风格、行为据测、谈判行为、领导魅力等(张平, 2004)。如使用心理传记法对罗斯福 Farnham(1997)、尼克松(Volkan, Itzowitz, & Dod, 1997)领导风格特点及差异的研究。随着心理传记的发展，关于政治人格的个案研究逐渐增多。到了 21 世纪之后，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有希律王(Kasher, 2006)、穆罕默德(Sina, 2008)等人的政治人格研究。同时，除了对逝世的政治人物关注之外，也开始关注在世或在位的政治首脑人物的研究，如对小布什(McAdams, 2010)和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Falk, 2010)的研究等。此外，也出现了一些政治人物人格特征的比较心理传记学(comparative psychobiography)研究的论文(Capps, 2006; Fitch & Marshall, 2008)。这些研究都是以个体的生平事件为基础，通过心理传记法对其进行概括和总结，并对他们人格成因的心理动力进行分析。

关于政治人格的群体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格特征、政治态度、群体意识等对政治活动的影响，采用的方法多是实验法，通多对大量被试的问卷调查等。Jonason(2014)通过对 1389 大学的研究调查发现人格特征可以预测个体的政治态度，自恋、神经质、外倾性这些人格特征和保守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联系，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具有较低的自由主义态度。Jones & Hudson(1996)、Pancer, Brown, & Widdis Barr(1999) 研究结果发现大众通过对政治领袖的人格特征判断，可以形成对领袖的总体评价，进而影响他们的选举决策，人格特质的分析是研究政治领袖和选举行为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领导者的人格特征不仅影响自己的领导行为，也同时影响了大众对领导者的认识。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既有个案研究也有群体研究，研究内容既包括领导者的政治人格特征又包括政治人格特征对政治活动的影响。但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仍以领导者的个案研究为主，研究方法依然采取传统的心理传记法。

1.3.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大约开始于上世纪 30 年代,但研究相对较为零散,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八十年代之后,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逐渐增多。国内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同国外大致相似,也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领导者政治人格的个案研究;另一部分是关于政治人格的塑造、转型及生成机制的群体性研究。

上世纪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有颜世安(1988)对帝王政治人格的研究,葛荃(1991)对君主政治人格的研究,马瑞(1991)对梁漱溟的儒家政治人格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都倾向于政治、哲学和历史方面,完全没有涉及到心理方面。研究者从社会与历史的发展和要求方面,分析了政治人物的政治人格特征。不同时代造就了不同的人格特征。社会环境作为一个宏观的影响因素固然不能忽视,但除了外界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个体的差异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同的政治人格形成有不同的心理动力。总之先前的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较为浅显。

到了本世纪之后,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则更为全面,不仅展示了其人格特征,更进一步分析了其人格特征形成的心理动力。这些研究逐渐增多,如毛泽东的政治人格研究(陈瑶姬, 2013), 苏轼出世入世的矛盾人格研究(王世明, 2013), 张居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研究(汤舒俊, 郭永玉, 2011), 容闳的政治人格分析(郭颖, 2009), 斯大林的政治人格成因(李爱军, 2008)等。这些研究主要通过心理传记法对政治人物进行精神分析,分析其人格形成的内在心理动力,相对之前的研究更为详细和深入。

此时的政治人格研究依然集中于政治领导者的特征及形成动力的研究,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关于大众理想政治人格的相关培养研究,如李晓芸和张平(2007)关于政治人格生成机制的探讨,裴士连(2006)关于青年军官政治人格的塑造,任丽萍(2004)关于现代政治人格的塑造等。政治人格的成因主要受先天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关于塑造部分,则主要关心后天的影响因素,如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有后天的努力。另外还有一些关于政治人格角色认同的研究。这些研究属于群体研究,多数是从思辨的角度进行分析,没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不同于国外的实验研究。

综上所述,国内政治人格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政治和哲学,而更侧重于心理学,更加注重个体的差异研究。总之国内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内容越来越多样化,但研究方法依然局限于精神分析法。

1.3.3 国内外研究不足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研究内容上非常丰富和完善，可分为群体研究和个案研究，既有关于政治人格特征的研究，又有关于政治人格成因、理想政治人格塑造等的研究，但仍以个案研究为主。在研究方法，国外有一个明显的分层，个案研究多数是心理传记法的质性研究为主，群体研究以实验为主；国内无论是群体研究还是个案研究都是以质性研究为主，缺乏量化研究，研究的外部效度不大。总之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研究方法上相对较为单一。虽然心理传记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质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还没有很好地运用到政治人格的研究中。因此本研究欲采用质量相结合的心理传记法对政治人物的人格特征及形成的心理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

1.4 洪秀全政治人格的研究现状及不足

1.4.1 洪秀全政治人格的研究现状

到目前为止，关于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研究已经持续了大半个世纪。虽然国内对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大多数侧重于纯史学研究，主要包含以下内容：史料搜集和考证研究(郭毅生, 1981; 庾裕良, 陈仁华, 1989); 政权性质研究(董蔡时, 1980); 人物研究(吴善中, 2010); 政治研究(王明前, 2005); 军事(韩品峥, 方久忠, 1981)、外交(茅家琦, 1984)、经济(夏春涛, 2012; 郭毅生 1991)、文化研究(陈萍萍, 2006); 典章制度研究(夏春涛, 2004); 宗教和区域史(徐修宜, 2005; 夏春涛, 2006)、社会史研究(朱东安, 1999; 夏春涛, 2000); 工具书和通史研究(简又文, 1962; 崔之清, 2002)。总而言之，这些关于洪秀全的研究大多是从政治、军事角度对历史人物进行史学的分析，对人物的政治人格特征关注相对较少。

国内对洪秀全的人格研究相对较为突出仅有魏万磊和陈德鹏。魏万磊借助埃里克森的“同一性”危机理论对洪秀全政治人格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洪秀全的人格特征主要源于他的“同一性”危机(魏万磊, 2004)，并认为依赖性和竞争性是他人格的核心特质。由于他对考试升官赋予了过重的象征意义，童年时期的同一性危机在多次应考失败后重新凸现出来，形成了偏执、消极的同一性，并滋生了反叛心理。在科考失败后，他没有选择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通常模式——竞争和适应，而是选择了改造环境，这是一种攻击性的防卫机制。太平天国运

动的爆发和天京事变都是由于这种“同一性”危机造成的。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他又借用集体心理学理论对太平天国败亡进行了分析(魏万磊, 2006)，由于天京事变摧毁了太平军将士和洪秀全的心理纽带，最终造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2007年，魏万磊又运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集体自我的观点和社会同一性危机分析了洪秀全久病不医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他的原罪意识，造成了他的自杀行为。通过魏万磊的一系列研究，实现了对洪秀全人格研究的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结合，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性。然而对于魏万磊的研究，程德鹏(2007)曾发表文章对其进行过批判，认为魏万磊对性本能论和“同一性”危机理论运用得不够成熟，并且还有一些问题没能很好的解决。其一，洪秀全一方面作为农民领袖另一方面又作为“邪教”首领，这些都是有可靠的史料和理论依据的。洪秀全是如何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和行为同一于一身的。其二，洪秀全早期的人格特征与他的“异梦”之间的关系，还有信奉上帝之后的人格特征仍需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同时陈德鹏还论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洪秀全的人格又暴力倾向，幼年时有轻度的神经质，还认为洪秀全的“异梦”是尊重需要受挫的表现，并指出后期洪秀全的人格发生了退化（人格退化是指人格更倾向于破坏性，敌意性、向后性，对抗生命）。这种人格退化，直接造成了太平天国经济政策的矛盾性，最终使太平天国运动走向了失败。另外还有赵璐和乔志强(2002)、杨玉荣(2004)、廖胜和王晓南(1999)、余冬林(2001)、张宏杰(2005)、王龙(2013)、陈军和刘奎(2005)、彭国兴(2002)等人都曾发表论文涉及到洪秀全的个性特征或心理动力方面的研究，如洪秀全的科举情结、自卑心理、权力人格和性格特征等，但这些研究都相对较为零散和片面。

1.4.2 洪秀全政治人格研究的不足

综上所述，关于洪秀全人格的研究，更多的倾向于他政治人格的消极一面。前人的研究都是关注洪秀全的政治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分裂和失败的研究。然而正如陈德鹏(2007)所说，洪秀全的身上有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一种是进步的，一种是后退的，但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同时集中于洪秀全的身上。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他的进步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都给太平天国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洪秀全的带领下，太平天国颁布了《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这些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并使太平天国一度占领十八个省。此外，同中国历史上其它的农民起义相比，太平天国运动有自己的独特和

进步之处。这点从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中就可容易得出。如明末的李自成起义，提出的口号是“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绿林赤眉起义的口号是“刘氏复起，李氏复辅”等等，而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提出的口号则是“无处不均，无人不饱暖。天下人田，天下人同耕”，由此可看出洪秀全突破了以往农民领袖的阶级局限性，提出了社会和人们温饱的革命目标。这些事例都明显的体现了洪秀全政治人格中的积极一面。但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学者涉及到。

2 问题提出及研究意义

2.1 问题提出

历史学家们对历史资料考证和分析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历史人物的人格特征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共同影响的,既有环境的因素又有自身的人格特质因素。太平天国运动既成功了又失败了,说成功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农民的觉醒,也代表了中国人民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探索,具有很大的意义。然而它又是失败的,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前人的研究多关注洪秀全人格中的消极部分。然而政治人格作为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只关注个体消极的一面很难对个体形成全面的认识。若要对洪秀全形成全面的认知,必然不能忽略他人格中积极的一面。洪秀全的积极和消极的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前人研究的不足,本研究将系统和全面的研究洪秀全的矛盾人格特征对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影响,并对其人格特征形成的心理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2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洪秀全政治人格特征的研究,既丰富政治人格的研究,又进一步充实了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同时,本研究采用的是心理传记法,也对国内心理传记的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本研究作为一个非凡人物的个案研究,深入分析了人格的变化和发展。然而对于人类心理的研究,无论个性还是共性,都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体呈现,正是这种对于独特的个体研究的个案研究为心理学的普通研究奠定了基础。一方面个案研究作为一个特殊的事实,可以借助已有的理论推演出新的理论;另一方面,个案作为部分性事实,可以显示整体性事实(王富伟,2012)。本研究通过对洪秀全政治人格的研究,分析个体的政治人格对政治的影响,应用人格理论来解释个人生命等,也可以提供经验资料修整或创建新的人格理论,因此本研究也对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另外通过对非凡人物的研究,可以在普通人和成就人物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让每一个有志青年都可以看到“人人皆可为尧舜”(舒跃育,2014)。

实践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洪秀全政治人格特征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人格特征与人物成功和失败之间的关系。对于洪秀全成功的部分可以给我们当今的人类以启示和指引,更是有利于普通大众的理想政治人格塑造。对于

洪秀全失败的研究，可以发现其性格中的致命弱点，也给我们以借鉴，进而避免失败。最后关于洪秀全人格的研究还有助于历史学界对于太平天国史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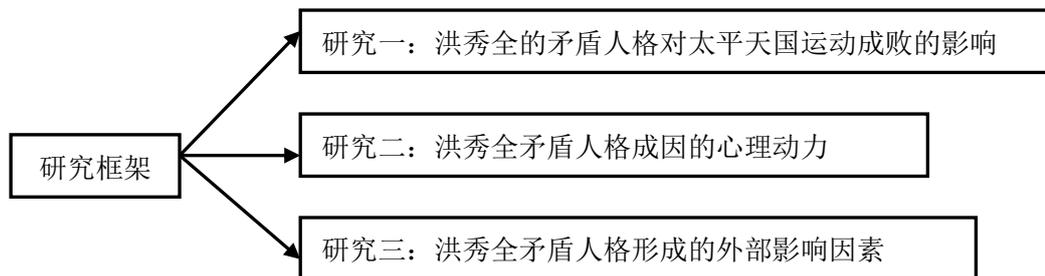
3 研究构想

3.1 研究目的

- (1) 通过质量相结合的心理传记法分析洪秀全的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成败的影响。
- (2) 通过对洪秀全生平主要事件分析探究其矛盾人格形成的心理动力。
- (3) 通过史料分析外部因素对洪秀全矛盾人格形成的影响。

3.2 研究框架

本研究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洪秀全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影响。首先利用质量相结合的心理传记法探究了洪秀全的矛盾人格，然后纵向将洪秀全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指洪秀全早年从事科举考试时期（1814年-1843年）；第二阶段是从第四次科举失败后开始准备发动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1843年-1853年）；第三阶段是从定都天京到天京的陷落（1853年-1864年）。分别从这三个阶段分析洪秀全的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影响。第二部分，洪秀全矛盾人格形成的心理动力。横向将洪秀全的一生分为宗教思想、个人生活、妇女政策、政权建设四个方面。分别从这四个方面分析洪秀全矛盾人格形成的心理动力。第三部分，洪秀全矛盾人格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代际影响、家庭影响、重要他人和环境影响。



4 研究一：洪秀全的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影响

4.1 洪秀全矛盾人格初探

通过查阅史料，以表格的形式列举一些有关洪秀全的事例。

表 1：洪秀全有关事件列举

相对消极的一面	相对积极的一面
洪秀全十六岁开始，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屡试屡败。 “生杀由天，诸官莫得违”， “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王戊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1986） 在 1851 年制定的《太平礼制》中，按等级尊卑规定了各种繁琐而庸俗的称谓。	屡试不中，他激愤地说“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要自己来开科取士。”（《金田起义》） “强不犯弱，众不犯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牟安世，1979）
定都天京之后，洪秀全在一通诏旨中说道“一统江山已到，胞们宽草（心）任逍遥”（张德坚，1952）	“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女”并在天京颁布解放缠足令（牟安世，1979）。“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 “眼前一阵荣光，坚耐享福万万年”（夏春涛，2000）
天王府后妃近百，女官成群（王戊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1986）	《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提出一夫一妻制
洪秀全的宫殿“惟外面纯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日天朝门，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沤兽环，五色缤纷，侈丽五匹。其宫殿堂庑，下及窠庖漏，无不如是。”（张德坚，1952）	洪秀全等也“敝以草履，徒步相从”与将士们“枕戈而眠，冒雪而征”（张德坚，1952）
“靠实于天，不敢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李秀成，1952）	“前日明清之候，保将封官，择有才而用”（李秀成，1952）
朕之天兵多过于（于）水。（李秀成，1952）	

从上述表格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洪秀全作为一个农民领袖的革命者，具有革命和反叛的一面，他能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提出人人平等的口号，敢于提出对清王朝的反抗，当四次科考失败之后，又提出自己要开科取士。在革命性的同时，他身上也有很大的保守和落后性，如，革命形势稍微好转，他就开始沉溺于物欲的享受中，开始放弃革命时的斗志。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更是将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完全失去了初期的革命精神。我们在洪秀全的身上可看出鲜明的两种矛盾人格，一种是追求进步的人格特征，一种是保守落后的人格特征。这两种

矛盾的人格特征在洪秀全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4.2 相关概念界定

“革命”一词一般用于指突然的政治变革，但实际上这一措辞可以用来指一切突然的变化，或者是表面上突然的变化，无论是信仰、思想还是学说，因此勒庞(Gustave Le Bon)从革命对象这一角度考虑，将革命分为了科学革命、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勒庞, 1913/2004)。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通过传教，招收教徒，并利用宗教思想控制人们。在此过程中宣传上帝是唯一真神，打倒孔子，焚毁儒家思想。随着教徒的增多，加上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最终爆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新的政权。由此可看出洪秀全领导的这场运动是一场政治革命和宗教革命。洪秀全作为这场革命的主要领导者无疑应是一个革命者。威廉·H·布兰察德(1984/2004)在《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中将革命者分为了四种类型：第一部分包括那些无论如何也算不上觉悟的革命者，他们是一些没有肩负世界使命的社会反叛者。第二部分包括这样一些人，他们是自觉地将自己看成是给世界带来革命剧变的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将超越国界而获得实践。第三部分既包括革命的理论家也包括革命的行动者，但他们都发现，难以接受革命成功后的领导地位，甚至在革命胜利后常常为他们的人民的道德发展而担忧，而不是为管理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担心。第四部分我们将研究那些把行使权力问题上的顾忌抛开了的胜利的革命者。张宏杰(2005)将洪秀全评价为“一个心不在焉的革命者”，他认为洪秀全的革命生涯是误打误撞的。魏万磊(2004)将洪秀全评价为一个反叛者。显然洪秀全是缺少革命觉悟的，应该属于革命者的第一种类型，即社会反叛者。反叛者的理想是实现人的、所有男人与女人的完全平等，一个在任何社会体系中少有可能实现的理想(布兰察德, 1984/2004)。反叛者身上的革命性是不彻底的，并且带有空想主义的，这些都可以从洪秀全的身上明显的看出。同时反叛者由于缺少革命的觉悟性，因此在他的身上除了一些革命的特征之外还有一些，在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落后的思想特征。洪秀全属于反叛者的代表，他的革命性与孙中山、马克思、甘地等人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在洪秀全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先进的打破传统的思想特征和行为，同时又有着落后、迷信和守旧思想和行为特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洪秀全的进步的、积极的、创新的思想和他的反抗精神定义为革命性的人格特征。同时将他迷信的、守旧的、消极的思想和不思进取，贪图享受的腐败的行为定义为

保守性的人格特征。

4. 3 验证洪秀全的矛盾人格特征

4.3.1 研究方法—特尔菲法

利用特尔菲法验证洪秀全是否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矛盾人格。特尔菲法是采用函调的方式(安文铸, 1990)。由预测组织者向所聘请的专家门寄调查表, 专家们分别对调查表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预测, 寄还给预测组织者, 预测组织者将专家们回答的意见综合、整理归纳并做统计分析后, 再匿名反馈给各个专家, 再次征求意见。经过几轮反复函询, 形成比较一致的专家意见, 预测组织者即可据此整理出较为可靠地预测方案。所选的专家应该是从事该领域研究或相关领域 10 年以上, 并且专家人数不少于 13 人(胡志, 周达生, 1989)。本研究所选的专家是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博士研究生, 他们分别来自南开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

4.3.2 材料

本研究选择的测量工具是郑剑虹(1997)在黄希庭等(1992)编制的人格形容词检测表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所形成的新的人格形容词检测表。该表共有 248 个形容词, 采用七级评定, 分别为“完全不符合”、“比较不符合”、“稍不符合”、“不能确定”、“稍符合”、“比较符合”和“完全符合”。该问卷见附录 1。

4.3.3 评定结果

第一轮评定, 通过 15 名专家对 248 个形容词进行评定, 被试间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930。选出平均分在 5 分以上(不包含 5 分)的词语。最后选出了 19 个词语, 分别为: 竞争的、上进的、奢侈的、坚强的、疯狂的、出众的、好胜的、机智的、反抗的、有为的、冒险的、开明的、能干的、糊涂的、腐败的、迷信的、细心的、虚伪的、残酷的。然后进行第二轮, 将这 19 个词语发给每一个被试, 采用 3 级评分(不同意, 不确定, 同意)。最后经专家们的一致同意, 选定的人格形容词有好胜的、上进的、迷信的、反抗的、奢侈的、腐败的(见表 2)。迷信的、奢侈的和腐败的这三个词语分别表示了洪秀全的保守性的特征, 而好胜的、反抗的、上进的这些词语则分别表示了洪秀全的革命性的人格特征。从这些人格形容

词可以明显的看出洪秀全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这两种矛盾的人格。

表 2: 洪秀全矛盾人格的特征

革命性	保守性
好胜的	迷信的
上进的	奢侈的
反抗的	腐败的

4.4 洪秀全矛盾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成败的影响

人格对政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人格以不同的方式对政治信仰和政治活动产生影响的事实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王丽萍, 2002)。人格通过渗透于主体内心的某种倾向性来影响政治行为的,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客观事物对人产生作用或人对客观事物作出反应,其中介便是人格,人格对政治行为的作用大致有三种途径:态度对行为和判断的影响;信仰促成主体追求某种政治行为倾向的内在动力和制约因素;不同的气质类型影响人的行为(洪鹏, 2007)。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其人格特征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他的人格特征也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成败。

纵观洪秀全的一生,从科举的失败到创立拜上帝教再到金田起义开始革命,然后到定都天京,而后天京事变直到最后天京落陷,他的一生经历了好几个转折点。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人格特点,本研究将洪秀全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指洪秀全早年从事科举考试时期(1814年-1843年);第二阶段是从第四次科举失败后开始准备发动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1843年-1853年);第三阶段是从定都天京到天京的陷落(1853年-1864年)。分别从这三个阶段分析洪秀全的人格特征对太平天国产生的影响(见表3)。

4.4.1 第一阶段

1814年,洪秀全出生于广东省花县福源水,后迁居官禄埗村,原名火秀。他出生于农民家庭,家中排行第四,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大哥洪仁发,二哥洪仁达,姐姐洪辛英,父亲洪镜扬是一个本分的客家农民。秀全的生母王氏早逝,由继母李氏抚养长大。“洪秀全自幼好学,七岁入塾读书。五六年间,即能熟读‘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其后更自读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均能

一目了然。读书未几即得到其业师及家族之称许，其才学之优俊如此。”（韩山文，1952）由此也可看出幼年的洪秀全好学、上进，也因此得到了父亲的偏爱和族人的期望。而洪秀全也将光宗耀祖作为己任，从十六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按当时的思想意识来说，洪秀全完全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士子，想通过科举而取得功名。在此时的洪秀全虽然很有上进心，但深受封建社会思想的熏陶，是封建社会读书人的代表，其思想仍是处于保守阶段。1836年洪秀全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到广州应试时得到了一部基督教徒梁发所编的《劝世良言》。他当时只是随便翻阅一下，就将此书扔到了书箱中。这次考试，洪秀全仍然没有被录取，他大失所望，但也没有其他的办法。1837年洪秀全再次参加考试，又一次失败，积攒了很久的怨恨，使得他大病四十多天。洪秀全在病中升天，梦到了一个满头金发，身穿皂袍的老人（即天父皇上帝）授给他一把宝剑，命他斩妖，并封他为“天上大道君王全”（韩山文，1952）。对于这一点，建国初期，有些学者认为洪秀全由于科场失意，痛苦，抑郁、忧愤之极得了大病，而产生了“奇异的心灵”和“可见的幻觉”，其实，洪秀全在病中产生幻觉是可能的，但绝不是什么“奇异的心灵”，而是洪秀全开展剧烈的思想斗争，流露出对封建统治的极度愤恨和强烈的反抗（《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记》）。此后洪秀全将名字改为“秀全”以避免和“爷火华”的忌讳。另外复旦大学的潘旭澜教授（2005）认为洪秀全的改名也是费了好大的心思，一方面为了避讳，并一方面“秀全”拆开就是“禾（吾）乃人王”，表明了洪秀全要做人中之王的意思。洪秀全的改名也表明了他的错综复杂的心思，想要对清朝做出反抗，但是并没有实际行动，只是改了自己的名字。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洪秀全的迷信思想，将希望寄托于名字上。然而梦醒之后，洪秀全慢慢恢复平静，生活又回归到了过去。1843年，洪秀全第四次参加科考，但是仍以失败告终，随后，在回家的途中，口吟《龙潜诗》一首（崔之清，胡臣友，1994）：

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

等待风云齐聚天，飞腾六合定乾坤。

回家后，便决定不再考清朝的试，不再穿清朝的衣服，要自己开科取士。此时的洪秀全已到了而立之年，经过四次的科考使他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中，洪秀全表现出了一些上进的和反抗的人格特征，但是最终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他只是借助梦表达出来。在革命性和保守性人格的交织中，保守性仍是占据主导地位，并促使他一次次的参加科考。正是由于这

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感受到了很大的挫败感，进而导致了洪秀全对清朝腐败统治的愤怒，为后来接受《劝世良言》的思想打下基础。从此之后，洪秀全的思想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在加之当时各地起义的不断爆发，促使洪秀全走上革命的道路。总之，由于洪秀全的保守性人格给其带来的失败，直接影响了洪秀全的反抗意识，这些都为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4.4.2 第二阶段

1843年，洪秀全在李敬芳的推荐下，开始潜心阅读《劝世良言》，并对其中的观点大为赞赏，并按书中的方法自行施礼，将自己私塾中的孔子排位丢弃。洪秀全的这一举动也标志着他反抗行动开始。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等人外出传教。因期间受到挫折，洪秀全于11月回到花县，冯云山独自开始传教。1845年—1846年写了一系列的著作，系统的阐释了拜上帝教，并宣扬了他要建立一个太平世界的理想。其中《原道救世歌》略有基督教色彩，但是不甚浓，主要是说，上帝为唯一真神，人无分贵贱贫富都可以敬拜，并没有明显的对清政府的反叛思想。《原道醒世训》则标志着洪秀全的思想前进一步，他开始把视线由个人转向社会，批判社会的黑暗和混乱，产生了改变现状的愿望，并提出了改造社会的理想(王戊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1986)。这些作品反映了洪秀全思想的变化，由先前的封建保守逐步转变为初步的反抗。对清王朝的态度也由之前的恭维恭敬发展到后来的嗤之以鼻。思想的变化，使洪秀全更多的表现出革命性的人格特征，尤其是反抗性的人格特征的初步表现。尽管这些作品反映了洪秀全的革命性的人格特征，但这种革命性并没有付诸于实践，由于洪秀全的懦弱，使他仅限于纸上谈兵。他有反抗的思想但缺少反抗的信心和动力，这也充分体现了洪秀全的思想和行为的矛盾性。1847年，冯云山已经拥有了两三千的教徒，并培养了一批骨干人物。此时，洪秀全再次决定去广西，与冯云山会合。这时洪秀全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它反映了两个敌对营垒的尖锐斗争，他以凡间的兄弟姐妹为一方，清政府则代表着妖魔鬼怪，并宣扬他们为天下兄弟姐妹的敌人，标志着洪秀全的思想发展到了新阶段(王戊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1986)。冯云山的传教大大增加了洪秀全的革命信心。与此同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加快了反清准备。于同年10月创立了拜上帝教的领导机构。这时的洪秀全已有了很大的变化，成为了一个为了贫苦农民而起义的革命领导者，与科场彻底决裂，走上了反清的道路。由于在传教中受到当地政府的镇压，冯云山被抓，使领导集团大为震动，洪秀全

做诗(崔之清, 胡臣友, 1994):

近世烟氛大不同, 知天有意启英勇。
神州被陷从难陷, 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 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 黑雾收残一鉴中。

透露自己效仿刘邦和朱元璋, 走革命道路。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制定了圣库制度, 提出所有财富共同拥有和平均分配的理想制度。随后在 1851 年轰轰烈烈的金田起义爆发了。随后洪秀全等领导者带领太平军转战武宣、象州, 攻克永安, 最后直到攻占南京。在此期间, 洪秀全号召全军“不贪生怕死, 不贪安怕苦。” 1852 年 4 月, 城内粮草殆尽, 洪秀全向全军发出突围令, 命令全军“男将女将尽持刀, 现身衣着仅替换, 同心方胆杀妖, 金宝包袱在所缓”, 号召将士“欢喜踊跃, 坚耐威武”, 精装从简, “放胆诛妖”(《洪秀全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 太平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令清军闻风丧胆。直到攻克南京之前, 洪秀全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英勇的革命者, 带兵杀敌, 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还提出了很多具有先进性的政策, 如男女平等, 女人也可以带兵打仗等。金田起义之后, 洪秀全将广大受众分为了男营和女营, 并由女营组成了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的第一个娘子军(郭蕴深, 2001)。对于太平天国时代的妇女, 呤喇曾说过这样的话:“太平天国的妇女可以自由交际, 他们的地位被大大的提高, 这是标志太平天国超越清政府的无数革新措施之一。”(呤喇, 1985)从洪秀全的身上, 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反抗性、上进性和好胜性的革命性人格特征。在太平军中, 洪秀全提出男女分营, 并提出一夫一妻制, 然而这种制度对于各王是不适合的。早在 1851 年春, 洪秀全就有 15 名妃子了(夏春涛, 2003)。而杨秀清在 1854 年就有 36 名王娘(谢介鹤, 1952)。据史料记载, 在 1852 年除夕, 太平天国便曾经在武昌阅马厂选妃, 一共挑选了 60 有殊色的少女(陈徽言, 1952)。定都以后, 这种选妃制度更是被进一步固定。这些史料都表明了洪秀全的言行不一, 制定的制度只是为教众制定的。这些政策是洪秀全腐败人格的表现。而这些政策也在后期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占领南京之后, 关于定都问题, 领导者内部发生了分歧。摆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继续进攻, 将革命进攻到底; 一是满足于现有革命成果, 在南京停留下来, 分兵北伐东征(牟安世, 1979)。一部分以罗大刚为代表的将领不赞成定都南京, 另一部分是以洪秀全和杨秀清为代表支持定都南京。在革命形势飞跃发展的情形下, 洪秀全曾一度有过要将战争进行到底的念头, 李秀成说:“此时天王与东王

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与欲结往河南，欲区河南为业。”(李秀成, 1952) 但是最终还是在南京定都，并根据天父主张“奉天命以治天下”(杨秀清, 1952) 的教理，将国改成天国，王改成天王，京改成天京，于是南京则改为了天京。从定都天京的问题上，洪秀全是有一定的革命觉悟，但是最终仍是趋向于保守。

综上所述，在第二阶段，洪秀全即表现了一些帝王将相的庸俗行为，但更多的还是以革命性人格特征为主。在此阶段，洪秀全带领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最终定都南京。此时，洪秀全的革命性人格对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正是由于他的进步思想，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政策和纲领的制定。可以说，洪秀全的人格特征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胜利。

4.4.3 第三阶段

1853年，太平天国最终选择定都在南京，而后洪秀全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建设，健全和加强天朝各级政权体系，他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第一修建王府，定朝仪，争名分，别尊卑；第二，完善官职制度；第三，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的建设(崔之清, 胡臣友, 1994)。洪秀全此时指定的各项政策和先前已有了很大的区别，虽然定都不久就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描述了“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的理想社会，但是他还颁布“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一系列的封建礼制，还规定了一套显示其无上尊严的朝见仪式，通赞官高呼：“天王有诏：诏众官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跪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边。”读讫，百官如仪起立，东王白事出，则转身向内而立，百官皆跪其后，又三呼万岁，然后掩门而散(简又文, 1962)。洪秀全进入南京时，大摆天子威风，“身穿黄绣龙袍，足踏黄绣龙鞋”，端坐在16人抬的黄色大轿子里，“舆前有旗帜数百面，鼓乐和大锣数十对，喧阗数十里，舆后有执戈矛的护卫百万余人。”(彭大雍, 1982)道路两旁的文武百官和军民都要下跪迎接。洪秀全还在朝中大兴土木，将其宫殿建设的富丽堂皇，从此之后深入简出将国事交于杨秀清，据史料记载“贼伪示多出自东贼，背、冀间剑，亦或出自西、南，洪贼则决无。”(张汝南, 1952)从这些礼仪制度中，可看出洪秀全俨然以“皇帝”自居。作为一个农民领袖，洪秀全很难摆脱几千封建思想陋习的束缚，于是由一个革命者再次回归到了一个封建的保守者。这时洪秀全更多的表现了他人格中的腐败，奢侈的一面。

领导者内部的奢侈思想不断膨胀，由于洪秀全疏于国事，而杨秀清又不满足

于现有的权力和地位，多次利用天父附身向洪秀全及诸王发起挑战。由于领导集团内的矛盾日益决裂，最终于 1856 年 9 月，爆发了震惊内外的太天京事变，在变乱中，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被杀，翼王石达开后来出走，变乱后只剩下洪秀全一人执掌朝政。因此也可以说洪秀全是这场变乱的最终受益者，但他也受到文武军民的谴责。面对“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局面，洪秀全开始大胆的选拔和任用年轻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人开始受到重用，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二代主要将领，而后在香港、上海流离多年的洪仁玕更是受到重用，并于 1859 年在洪秀全的支持下颁布了《资政新篇》。洪秀全力挽狂澜，领导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占领了除上海、杭州以外的长江三角洲，并一度进攻上海，取得了开辟苏常基地的重大胜利，这些胜利都体现了洪秀全的坚定信念和胆略。洪秀全为了防止大权落入外人手中，开始重用两个兄长，并将其封为安王和福王。1860 年，清廷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调整和重建了相互关系，使得太平天国面对更大的敌手。面对孤危的形式，洪秀全选择誓死保卫天国，不惜战斗到最后。随着敌军实力的增大，李秀成兄弟只顾瓜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消极对战，导致安庆失守，最终苏浙基地沦丧，天京成为了孤城。从 1856 年到 1860 年，洪秀全对于有才干的将领总是冷一阵，热一阵，他最信任的就是自己的兄长和族弟洪仁玕。另一方面，在洪仁发、洪仁达等人主持朝政下，洪秀全又开始大封诸王。结果是破坏了太平天国选贤任能的干部政策，那些封王的人大都是些无功偷闲的人，那些日夜勤劳的人却反而得不到提拔，形成一种“有才能而不主不用，庸愚而作国之栋梁”（李秀成，1952）的现象，使得人心更加不服。由于封王过多，致使王爵本身也形成了等级，《黄文英自述》中说：“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政，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后来就乱了，有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两千七百多王。”（黄文英，1952）洪秀全将朝政交于自己的兄长，自己则再次开始研究宗教，企图用宗教来控制人们。在安庆失守之后，洪秀全更是满口的天父真道，“靠实于天，不肯信人，万事俱是有天。”（李秀成，1952）将希望寄托于天兵天将，说什么“朕之天兵多于（于）水”。

他不遗余力地宣扬君权神授，企图借重神权来加强君权。不仅宣扬他自己的君权是上帝授予的，连他儿子的也拥有神授的君权。他竭尽心力所要证明的，是

他自己和他的儿子都是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甚至“睡紧都做的王，坐的江山”。荒诞无稽的《朝天朝主图》，是愚昧昏庸的代表作。他后期的著述，满纸天父天兄，言天说地，荒诞离奇(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1986)。在天京被围不久就出现了粮食危机，他却下诏令：合成俱食甜露，可以养生(李秀成，1952)。洪秀全由于带头食甜露，而染重病。在悲观绝望中，洪秀全拒绝服药，于1864年6月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败亡。围城中的洪秀全将希望寄托于上帝，而他这种迷信全知全能的上帝，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综上所述，在这一阶段中，洪秀全的革命性人格和保守性人格都有所体现，但是更多是迷信、腐败和奢侈的思想占据上风。洪秀全往日的英勇和智慧都全然消失了，不用说什么革命精神，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更是表现出了十足的愚昧和无知。后期的洪秀全虽然表现了一定的革命精神，但是最终仍是被迷信的思想所迷惑，保守的人格使得太平天国走上了灭亡的道路。

表 3: 洪秀全的人格特征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革命性	保守性
第一阶段	聪明好学，对中国历史及奇异书籍尤为感兴趣（上进性）	曾四次参加科考，封建儒家式子的代表（迷信性）
	梦中斩妖除魔（反抗性）	不被《劝世良言》的内容所吸引（迷信性）
	决定要自己开科取士，不考清朝试，不穿清朝服（好胜性）	将“火秀”改为“秀全”以避开“爷火华”，另外名字也给予了“人中之王”的希望（迷信性）
第二阶段	摧毁神庙（反抗的初步体现）	由于传教受挫，再次回到花县（懦弱性）
	提倡一夫一妻（进步性）	自己和各王却妻妾成群（腐败性）
	效仿刘邦和朱元璋走反抗的道路（反抗性）	最终没有将战争进行到底，定都南京（保守性）
	宣扬天下兄弟姐妹为一方（进步性） 成了娘子军（进步性）	
第三阶段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进步性）	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腐败性）
	颁布《资政新篇》（进步性）	身穿黄绣龙袍，脚踏黄绣龙鞋（奢侈性）
	天京事变之后，开辟了苏常基地的重大胜利（反抗性）	大兴土木（奢侈性）
		大量封王（腐败性） 不遗余力的宣扬军权神授，最终不战而败（迷信性）

4.5 小结

综上所述，革命性和保守性的人格特征贯穿于洪秀全的一生，并交替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保守性的思想和行为使得洪秀全追求功名无望。由于科考失败，洪秀全开始对梁发的小册子感兴趣，选择了拜上帝教，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革命性的人格特征使洪秀全开始获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迎合人心并具有上进性的政治政策。他的上进性、反抗性和好胜性使太平天国运动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直到定都天京，胜利的取得使洪秀全冲昏了头脑，开始不思进取，贪图享受。洪秀全的奢侈和腐败加剧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到了后期，洪秀全更沉迷于宗教研究，对任何人失去信任，只相信上帝，这种可怕的迷信思想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洪秀全在第一阶段更多的表现出了保守性的人格特征，第二阶段更多的表现出了革命性的特征，到了第三阶段又再次回归到了之前的保守性的人格特征，不再是像以前一样寄希望儒家思想，而是将希望寄托于耶稣上帝。因此可以说，洪秀全具有典型的矛盾性人格，即有革命性的人格特征又有保守型的人格特征，而他的太平天国事业以其性格中的革命性开端并获得成功，却以其保守性告终走向失败，他的人格特征直接造成了天平天国运动的成败。

5 研究二 洪秀全矛盾人格成因的心理动力

根据研究一的结果可得知洪秀全的矛盾人格主要表现在保守性和革命性两个方面。洪秀全的保守性人格主要可以概括为迷信的、腐败的和奢侈的；革命性人格则主要可以概括为上进的、反抗的和好胜的。洪秀全既可以说是革命者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保守者的代表人物。这两种典型的矛盾性人格贯穿于洪秀全一生的方方面面。根据洪秀全一生的主要事件，将洪秀全的一生分为四个主要的方面：宗教思想、个人生活、妇女政策、政权建设四个方面(见表4)，分别从这四个方面探讨洪秀全矛盾人格的心理动力。

表4：洪秀全矛盾人格的表现

具体表现方面	性格	
	革命性	保守性
宗教思想	信仰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 反对儒家，捣毁孔庙神像	迷信天父皇上帝，醉心于自己的“小天堂”
生活风格	与将士们同甘共苦，平易近人 生活简朴	修建天王府，深藏宫中，纵情享乐，奢侈浪费
妇女政策	男女平等，一夫一妻 女人放足，并带兵打仗	生活腐化、妻妾成群 制定各种政策限制妇女的
政权建设	多王制、集体领导	独断专行、任人唯亲

5.1 宗教思想——自我的调节作用

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起源于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农民革命往往都会带着宗教的色彩，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中的“太平道”；北宋方腊时期的“摩尼教”；元末红巾军起义中的“明教”、“白莲教”等。这些起义都是由宗教开始，进而引发了一场场的农民革命。正如恩格斯(1959)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所指出的：“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下受着折磨，可是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去的任何共同协议都无比困难。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任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黯然忍受这一切。”要使得安静的，不曾逾越

地方关系和地方眼界的农民起来革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了解，必须输灌他们以革命的精神，要做到这一点，秘密的宗教团体是最合适的。所以在中世纪的所有的群众起义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宗教信仰的选择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信仰选择，即在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选择；一种是宗教的选择，即在信什么宗教之间的选择(阮荣平，郑风田，刘力，2013)。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长达数千年的影响，虽然它没有像基督教一样以一种明确的教义形式出现，但是已经深入中国人民的内心，成为一种至高无上永恒的信仰。洪秀全一生的宗教信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信仰什么宗教之间的选择。而这一宗教信仰选择的心理动力则是本研究的重点。

幼年的洪秀全迷信于儒家文化，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希望通过传统的科举考试光耀门第。这也是每一个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对学子的普遍期望。洪秀全曾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家庭的贫困和长辈们对他的期待，使得读书赢得功名的念头从小就灌输在他的意识中，而且成为根深蒂固的影响。与同龄的孩子相比，洪秀全是优秀的，并过早的承担起了家里的责任。当别的孩子在尽情玩耍时，洪秀全则在刻苦的读书。关于洪秀全的童年史料记载相对较少，但是我们从这些仅有的史料中可以发现，其聪明好学，父母及族人常常接济他们“秀全尝负笈他方，虽其家计不丰，然为免其辍学，家中常乐于供给所需，有几位族人复赠以衣物。”(韩山文，1952)因此童年的洪秀全是在读书中和父母的期望中度过的。

童年时期，洪秀全的理想就是父母的希望，通过科举考试光宗耀祖。洪秀全的理想完全来自于对父母期望的传承。这种对父母的接受和承认实际上就是弗洛伊德所描述的超我(郭本禹，2009)。超我是社会权威的一种内在延伸，它遵循的是道德原则，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其形成和父母长辈的影响密不可分。洪秀全的超我就是科举成名，光宗耀祖。从洪秀全幼年的史料，我们可知他勤奋聪明好学，不同于其他的孩子，没有儿时的叛逆和为所欲为。由此可知，幼年时候的洪秀全是一个听从父母教诲的好孩子，人格以超我占据主导地位。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中除了超我，还有自我和本我。本我人格系统中隐秘、最原始的部分。本我的目的就是趋乐避苦。然而幼年的洪秀全总是在刻苦的学习，试想哪一个儿童不喜欢玩耍。我们也可推知幼年的洪秀全本我是受到压抑或部分压抑。本我的压抑是通过自我实现的。自我位于人格结构的中间层次。一方面调节着本我、超我和环境之前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受超我的约束。由于外界环境即父母的影响，本我被压抑，超我过度表现。自我的不良调节为洪秀全日后的矛盾思想和行为埋下了伏笔。

从1828年到1843年这十几年间洪秀全除教书之外的唯一任务就是参加科举考试，但不幸的是，“县考时，秀全每试必冠其曹，惟从未能得中秀才”（韩山文，1952）。洪秀全的身心深受打击，以致于1837年第三次科举考试失利后大病了一场，“于是在连年悲苦失意之中，秀全便得了一场大病。”这次的失败使洪秀全严重受挫，当前行受挫之后，个体就会采取心理退行的方法，将潜意识心理活动的内容激活（郭本禹，2009）。秀全在大病期间，连续的做了许多奇梦，梦见了许多异象。在梦中作诗（韩山文，1952）：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抓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梦是一种完全合理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满足（Strachey, 1979）。梦中所要满足的愿望来源于何处呢？弗洛伊德（1900/1987）认为这种愿望来源于四个方面：第一：在白天被激起的愿望，但是由于外部环境却无法实现，这样就将这个愿望搁置到了夜间。第二，愿望在白天可能已经出现，但却受到外界的反对，这样就将一个未满足和受压抑的愿望留到了夜间。第三，这个愿望可能与日常生活没有人和关系，而是只有在夜间才从受压抑的材料中醒来的那些梦。第四，就是夜间呈现的实际的愿望冲动（如饥渴刺激和性欲）。第一个愿望起源于前意识，第二个愿望是从意识中被赶到潜意识中去的，第三个愿望位于潜意识系统（沈德灿，2005）。由此可知，梦的来源是潜意识的，我们意识的愿望只有在成功唤起一个类似的潜意识愿望去加强他时，才能有效的激发起梦（弗洛伊德，1900/1987）。显然，洪秀全的梦来自于他的潜意识，即本我的愿望。由前文可知，幼年的洪秀全本我受到压抑，超我占据主导地位。当超我的理想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时，本我的冲动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增大。此时的本我也不再是简单的追求快乐，而是一种反抗，不仅是对父母的反抗，更多的是对社会不满的反抗。我们从洪秀全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思想和抱负。然而梦醒了，洪秀全又再次回到了以前的平静状态。本我已经处于一个濒临爆发的状态，但是在自我的调节下，再次压抑本我，超我占据上峰。洪秀全在1843年再次参加科考，又以失败告终。在这一阶段，显然自我在调节本我、超我和现实环境过程中是消极的，它总是一味的压制本我，在现实生活中不让本我得到任何释放。这种无限的压制必然会使个体产生焦虑，这种焦虑的根源就是

自我(沈德灿, 2005)。由于自我没能很好的解决本我的驱力、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那么自我就会产生焦虑。这种焦虑会迫使个体尽快的采取一种防御机制解除心理紧张达到个体内心平衡。就在此时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劝世良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劝世良言》中的内容使得洪秀全大彻大悟,不仅是因为书中关于儒教和科举功名的论述击中了他的心病,还因为书中的内容和他几年前大病时做的那场梦正好一一对应,“秀全读了忽地大觉大悟,他在这部书中寻得解释他六年前病中梦兆的关键,以为书中所言和他梦中所见相符之处很多。”(罗尔纲, 1947)书中的内容让洪秀全为自己的本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出口,就是反对儒家思想,反对当时的科举制度。因为他所信任的神佛菩萨、文昌魁星、灶君、土地等并没有保佑他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自我其实是在采用一种合理化(沈德灿, 2005)(是用一种自我能接受、超我能宽恕的理由来代替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和理由,如需找好的借口使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从而达到推卸责任或安慰自己的目的)和移置作用(沈德灿, 2005)(指个体对某人或某事物的情绪反应转移对象,借以寻求发泄的历程)的防御机制。《劝世良言》的内容使他为自己反对当时的儒家思想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同时又把自己的屡试不中怨恨都发泄到了对孔子、孟子等的思想的不满。因此他将自己私塾中的孔子牌位都遗弃了,并进一步不指出“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气”(《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以表达他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再也不相信神灵的保守。此时的自我已经达到了调节的目的。

在《劝世良言》的影响下,洪秀全先后撰写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主要著作,然而从现存的《百正歌》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首劝人行善的歌,全文四百余字,通篇宣扬儒家思想,并无明显的基督教色彩,正与不正的标准,全是封建伦理纲常,而以三纲观念为最突出(王戊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 1986)。由此可见,洪秀全行为的矛盾性,他并不是真正对文化的反对,而是对自己怨恨的发泄。他从基督教中吸取了“独一真神皇上帝”的思想,他信奉“皇上帝”是主宰宇宙的独一真神,从宗教信仰的排它性出发,猛烈地抨击中国儒、道、禅三教和多神崇拜,他认为神佛菩萨、文昌魁星、灶君、土地等等都是邪神。这一抨击贯穿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始终,根据张德坚所著的《贼情汇纂》卷12中的记载,太平军“所陷之处,凡学宫正殿两庑柱亦俱毁弃殆尽,任作贱,或堆军火,或为马厩。”山东临清“文庙大成殿焚,圣像及两庑柱无存者。各神像或剜目,或斫手足及首,无一全者”(《山东近代史资料:1卷》)。

对儒学的反抗是他表达自己反叛的第一步。也是其本我释放的最好体现，自我通过这种现实可行的方法调节并使得本我得到了部分的满足。随着冯云山传教的成功加之清政府的镇压，洪秀全开始了他真正反抗清政府的革命道路。

自我是否允许本我的满足要取决于外部条件。自我采取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取得对本能愿望的控制，决定是否允许本能愿望得到满足，或通过延缓那种满足，直到外部世界中具备了有利时机，否则干脆压抑本能欲望的兴奋(郭本禹, 2009)。此时，由于时机的成熟，洪秀全的本我欲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洪秀全利用宗教达到了他反抗的目的，然而“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实实在在的现实利益。”(恩格斯, 1959)洪秀全作为一个反叛者，一般都非常容易受到暗示的影响(勒庞, 1913/2004)。洪秀全在革命中以上帝的次子身份出现，是受到了梦中景象的影响。在梦中他替天行道，展出妖魔。起初他呼吁“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仅仅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牟安世, 1979)并大声疾呼天下男女同心协力“跳出邪谋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底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罗尔纲, 1956)自我采用合理化和移置的方式，反对传统儒学和封建专制制度改信上帝耶稣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无疑使洪秀全解除了内心的焦虑。而基督教的教义不能满足洪秀全日趋膨胀的权力，当自我再次受到欲望的支配时，他就又再次回到了原点。因此到了太平天国的后期，他为维护自己的皇权统治，确立自己的权威，建立了层级分明的等级制度。而为了维护这样的等级制度，洪秀全很自然的就用到了儒家传统中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尊卑贵贱、忠孝仁义等一套伦理道德来。不再视孔孟之书为妖书，规定“孔孟之书不可废”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儒家的经典进行了删改，“大王诏曰：咨尔史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史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朕披阅刊刻颁行。”(张德坚, 1952)受“胜者王侯败者寇”的传统思想影响，洪秀全将黄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领袖置于不正之列(刘继林, 2010)。洪秀全强调“朕即国家”、“朕即天下”，强调三纲五常，强调神权、政权、族权、夫权等封建伦理纲常、人人平等，处处均匀思想被洪秀全彻底否定，平等思想被不平等代替。此时的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和其它的封建王朝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而宗教也成了他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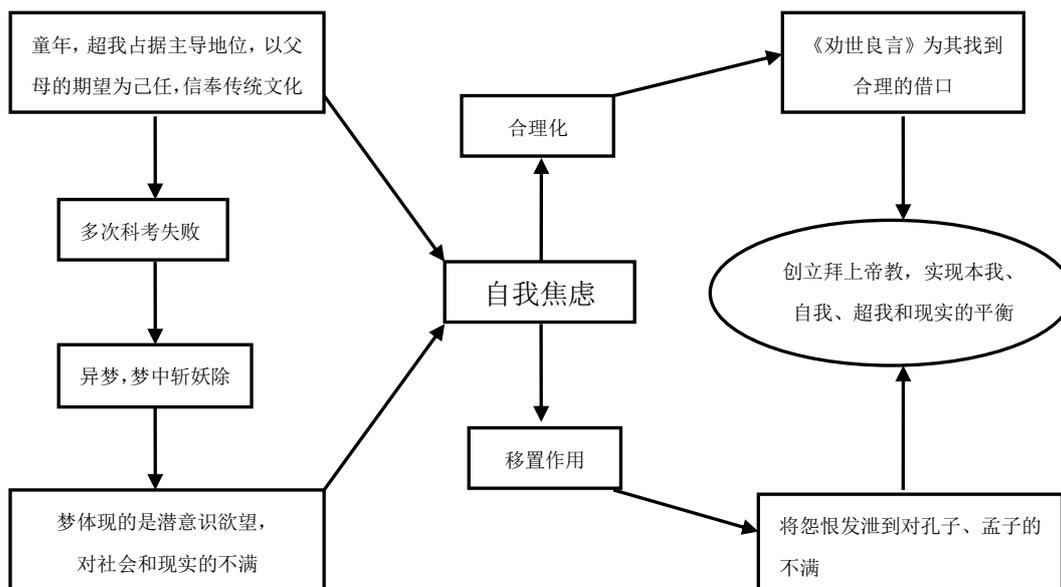


图 1: 自我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见图 1), 剥去宗教的外衣, 洪秀全反对的并不是传统儒学文化和封建制度, 起初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怨恨和不满, 后来又回归到传统儒学文化和封建制度, 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统治和权力欲望。对基督教义的宗教选择只是洪秀全为了适应自我调节的一种手段, 无论是什么教义只要能解除自我、超我和本我的矛盾, 他就选择哪种。因此在洪秀全的思想和行为中, 我们更多的看到了一种革命性和保守性的矛盾行为。洪秀全的宗教信仰是不虔诚的, 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传统文化, 洪秀全都能很好的断章取义而为满足自我所需。洪秀全对宗教思想的矛盾性是来源于自我的调节作用。

5.2 生活风格——对生理需要的过分追求

阿德勒将个体追求优越目标的方式称为生活风格。他认为不同的生活风格代表了不同的人格, 并标识了不同个体在社会中寻求表现的独特方式, 是不同个体处理问题的特有方式(田印红, 2007)。一个人的生活风格决定了他注重生活的哪些方面, 还决定了他观察到什么和忽视什么(杨小艳, 2006)。生活风格有很多种, 有积极向上的, 也有消极被动的。不同的生活风格是以不同的生活动机为基础, 健康的生活风格是注重社会优越动机而非个人优越动机(曾捷英, 周新林, 1992)。形成社会优越动机的重点是指学会合作, 发展社会兴趣, 促进社会和谐, 而个人优越动机则指缺乏合作精神, 以满足个人需要为目标。纵观洪秀全的一生, 他在

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生活风格，先前的生活风格是艰苦朴素，能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以追求大众的利益为目标，然而到了后期，他开始大兴土木，沉溺于自己的奢华生活中，而不顾农民大众的痛苦。

起义初期的洪秀全生活简朴，丝毫没有帝王的做派，甚至敌人对此也是认可的，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说，“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试，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1952）另据清方记载，太平军官兵都是“自携军火，裹粮以行，无舟车之载，安能觅轿焉？洪杨诸逆首亦自蔽衣草履，徒步相从。”（张德坚，1952）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洪秀全的与众不同，他与以往的其他农民领袖不同，具有进步思想和与现实社会的反抗精神。同时他还依据基督教义，把一切财富归于上帝，不许私有，“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天朝田亩制度》）所有起义众人，个人一切财产交公，由圣库统一调配，作战“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天父下凡诏书二》）。重新丈量土地，好坏搭配，按人口平分；设立和生活密切相关的百工衙，生产日用品；太平天国俨然成了一个理想的大家庭。洪秀全满怀信心地认为，如此则：“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太平诏书》）。由此可看出洪秀全在这一阶段更注重的是追求社会优越性的动机。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为了满足贫苦农民的需要，打击剥削制度，使他们都能过生平等、富裕的生活。

然而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个人生活却极度浮华，完全偏离了自己当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的。他开始大兴土木，建造天王府，穷极壮丽。史书记载，重建的天王府，“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张德坚，1952）洪秀全梦想着“小天堂”，他藉以号召太平军将士奋勇向前的目标，如今已缩小成了天王府。此时的洪秀全再也没有革命初期的那种兢兢业业的精神，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物欲满足上。他的生活风格由之前的追求社会优越的动机完全转变为了追求个人优越的动机。洪秀全对于物质的追求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朝晚两食，掌庖用金碗二十四只，备水陆珍馐，杯筋亦用金镶，后尔用玉盆玉杯，群贼多效之。”（汪堃，1952）洪秀全对衣物也讲究极致，他会令人到处搜集“鲜衣

华服，貂褕狐裘”（崔之清，胡臣友，1994）。后来更是用黄金制成各种物品，以显示他的权威，“头戴纯金制成的王冠，颈挂金制造项链。”“身穿金纽绣金龙袍，乘坐由美女手牵的金车。”（彭大雍，1982）洪秀全的这种奢侈行为以致圣库曾经黄金告急。然而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建筑任务，只用男丁肯是不够的，因此女人开始参加生产和革命，女人成为太平天国的主要劳动力。她们担负的生产劳动和后勤工作主要有：“开挖壕沟”、“送竹签子”、“割麦”、“割稻”、“抬砖挖沟”、“背米盐”、“负米舂稻”、“获稻负盐”、“担水”、“肩米负煤”、“掩埋死尸”、“捉草以饲马”、“搬移物体”、“抬水挖泥”、“研柴”、“搓麻绳”（罗尔纲，1979）等等。在太平天国中的女人地位是有所提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也体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政治的剥削。洪秀全对于优越的追求采用了一种夸张的、非正常的形式，不顾忌人民大众的利益，这是洪秀全的一种过度补偿，这被阿德勒称为优越情结（郭本禹，2011）。霍丽婷曾指出，过度补偿是为了摆脱卑微极力寻求满足，以掩饰其某些方面的自卑感，甚至不顾别人的需要和社会的需要，专横跋扈，贬低他人（祝传清，2013）。具体而言就是，追求优越的目标是将以前缺陷转变为优势，是某种需要得到满足，某种目标得到实现。成人如果儿童时期某种需要得不到满足，那么将导致其今后在其一生中不断追求这种需要的满足，乃至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如，如果一个儿童从小生活在贫穷的或物质资料极为短缺的环境里，那么将会导致其在今后的一生中不停地追求物质上的满足；同样，如果一个儿童从小生活在缺少关怀、缺少赞美的环境中，那么将会导致其在今后的一生中不断地追求显赫的名声，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在崇拜他仍不能使他安静下来（杨小艳，2006）。洪秀全对物质需要的过度追求也体现了他的自卑感，而他的自卑正是来自于对物质的缺乏。根据史料我们也可以得知，幼年的洪秀全家庭贫苦，读书都要靠族人的接济，其家庭耕田种菜，有一两头牛。而物质匮乏也是那个时代最为显著的特征，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就将巨额赔款以“分赔”“摊赔”“代培”等明目统统转嫁到了劳动人们的身上。但是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加上了新税捐”，造成了“大批军民赤贫如洗”（恩格斯，1959）。而洪秀全的老家广西处于孱弱的地位，正如咸丰初年，一个官僚所指出的：“广西民贫，官斯土者，率倭与边荒僻远，困苦异常，因而相率苟安，不思振作。”（王戍筌，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1986）当然洪秀全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其生活也是可想而知。但是作为和洪秀全一样科场失意的冯云山则不同，冯云山的“家道殷实”，从小开始读书，是地主阶级的下层知识分子（苏双碧，1984）。阿

德勒认为每一个儿童无论有无器官上的缺陷，儿童的自卑感总是普遍存在的(阿德勒)，然而家中的贫困，使得幼年的洪秀全有着很强的自卑感。从这也不难推出洪秀全迫切想改变自己生活的愿望。物质生活的缺乏使得洪秀全产生了追求优越弥补自卑的动力。没有人能够长期的忍受自卑感，它一定会使他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阿德勒, 1932)。因此，由于幼年物质的缺乏造成了洪秀全后期生活的极度奢侈。

然后为什么在初期的洪秀全和后期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风格呢？马斯洛(1987/2007)认为，人的需要可以生理需要(饥饿、性等)、安全需要、归属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要从低到高，只有满足了低层次的需要才会产生更高一个层次的需要。洪秀全对于物质需要的缺乏，幼年吃不饱，穿不暖，而这正是表明他生理需要的缺乏。然而在革命初期的洪秀全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对生理需要的追求。这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杜威和桑代克所强调的动机的可能性这一方面，大多数心理学家完全忽视这一方面。但总的来说，我们有意识的渴望一切实际可能获得的东西，如“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之后，他发现自己的希望活跃起来了，并且积极地为获得几年前未梦想过的东西而奋斗，一般的美国人希望有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的这些东西是可能的事情，他们暂时没有获得快艇或飞机的愿望，因为这些东西实际上距离普通美国人还较远，而且很可能在他们的意识中也不存在这种希望。”(马斯洛, 1987/2007)重视达到目的的可能性，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洪秀全先前的生活风格有很大的作用。革命初期，经济和物质还相对匮乏，这种环境还不具备实现他奢侈欲望的可能性。但我们从一些史料中，也可看出洪秀全早期就有对物质过分追求的欲望，起义初期，洪秀全就黄袍加身，诸王则布衣蓝缕(崔之清, 胡臣友, 1994)。在当时的环境下，洪秀全提出的均分政策已经满足了大家的温饱问题。马斯洛对于需要的满足，还提出了对需要满足的程度。对于需要的五个层次，一个需要得到满足，则另一个需要则会相继产生，但并不是说一个需要百分之百得到满足，下一个需要才会产生。事实上，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低层次需要大部分得到满足，则高层次的需要就会产生。一种新的需要的产生并不是一种突然的出现而是缓慢的从无到有的出现，例如如果优势需要 A 仅满足 10%，那么需要 B 可能还没有出现，而优势需要 A 得到 25% 的满足时，需要 B 可能显露出来，但需要 A 满足 75% 时，需要 B 也许显露出 50%(马斯洛, 1987/2007)。也就是说一种需要的满足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部分满足就可以了，而只有条件允许，才会有更大的满足。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直到定都南京，

太平天国的经济都是出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国库也是在不断的充实，对于这一点，我们从对外外贸易就可以看出，1845-1846年，出口的茶叶是57580000磅，生丝18600包，到了1850-1851年，出口的茶叶为64020000磅，生丝22143包，而到了定都之后，如1855-1856年，出口的茶叶为91930000磅，生丝50489包，从这些数字都可以明显的看出，太平天国的对外贸易兴盛，整体经济是初上上升趋势，尤其是在定都之后增加尤为明显。这样的经济发展为洪秀全及诸王的奢侈生活提供了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达到之后，洪秀全物质需求的欲望就会变得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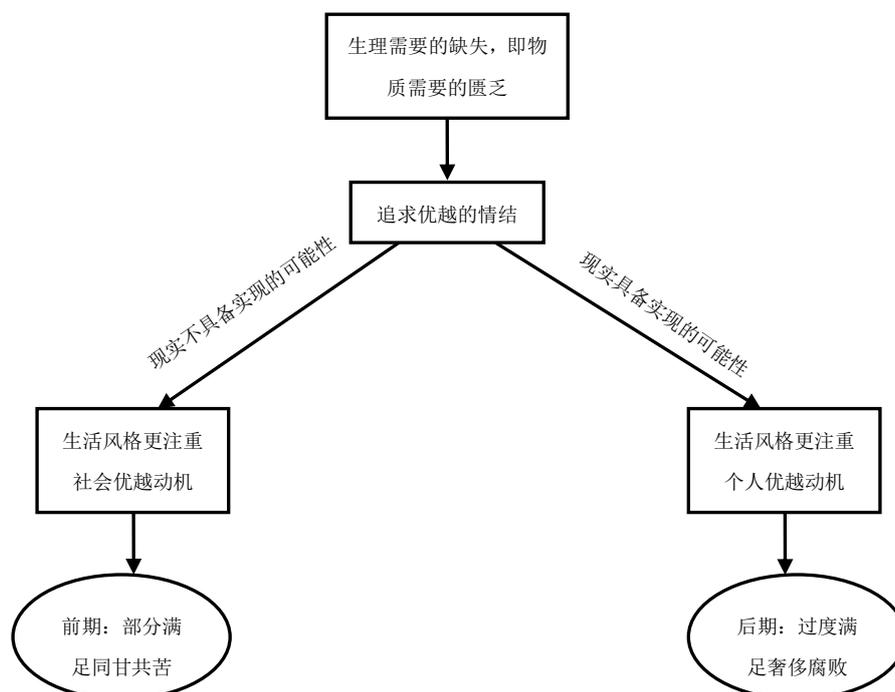


图 2：生活风格的变化

综上所述(见图 2)，洪秀全在生活风格上的革命性和保守性的根源心理动力是对生理需要的匮乏。由于生理需要的缺乏，造成了洪秀全的自卑感，而自卑感会变成精神生活中长久潜伏的暗流(阿德勒, 2011)。个体会通过对优越感的追求来消除这种暗流带来的紧张和不安。然而由于外界条件的不允许，洪秀全在初期更多的表现为注重社会优越动机，而到后期由于条件的允许，这种内在的生理需要动力就开始跃跃欲试，并且是连续不断的，无休止的，因此，他的生活风格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转变为更多的注重个人优越动机。

5.3 妇女政策——恋母情结

洪秀全对姐姐有着很深的依恋情结。当他落榜回到家中时，在异梦中说自己是“太平天子”，他骂其家人“没有心肝，没有良心”，但惟独对姐姐说“朕是真命天子，尔知么？凤姐（洪辛英在家名凤）到来见朕，朕用手比写朕乃太平天子，左手拿日头，右手拿月亮。”（《共证福音书》）他还说“他与妻子‘第一月亮’住在天堂的东边”（史景迁，2011）。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老婆”称为“月亮”的人，而他第一次说月亮时竟是对姐姐说的（魏万磊，2004）。梦本身具有着象征性的意义，象征所指的方向与我们的意识心理所感知的方向不同，它象征关联的要么是某种潜意识的存在，要么起码也是某种并非完全意识化的存在（荣格，2014）。在洪秀全的潜意识中，将“姐姐”化身为自己的妻子，魏万磊也曾说过洪秀全向往的是“先妻加姐姐”的女子。由此可看出洪秀全对姐姐有着不同寻常的依恋情结。幼年的洪秀全生母早逝，在三岁到六岁期间本该产生的恋母情结就转移到其他的女性身上，由于继母不能很快的取代生母的位置，很自然的，姐姐就承担起了母亲的角色。自然洪秀全儿时的性游戏极有可能是和姐姐之间进行的，这种在亲人之间的性游戏夹杂着神圣和性爱，不是单纯的性欲冲动。这种儿时的经历使得长大成人之后的洪秀全更加向往“姐姐”一般的女子。弗洛伊德将这一情结称为“俄狄浦斯情结”，主要指男孩爱的第一个对象就是自己的母亲，他想独占母亲而仇视父亲（弗洛伊德，1938/1987）。而这种情结表现在有意识领域就是需要母亲和父亲的亲昵和爱抚（弗洛伊德，1938/1987）。由此可见这种情结能否很好的进行转化并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主要取决于父母对其是否进行了足够的关爱。然而父亲又常常忙于劳作，自然不能给他足够的关注，同样哥哥们都随父亲耕作，而姐姐对其的照顾肯定也不会像母亲一般的细腻、周到。由此可知幼年的洪秀全没有得到父母的足够关爱。关爱的缺乏造成了洪秀全“俄狄浦斯”情节的固着。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情结既可以成为“宗教和道德的最后根源”，又可以成为个人心理失常的病因，在他看来，只有当这种情结得到了解决或被压抑之后，儿童的人格才可能渡过这一阶段继续向前发展。而幼儿抚育环境的安全感即是否得到父母的充分关爱，也影响人格形成的基础条件（布兰察德，1984/2004）。显然，洪秀全的这种情结并没有得到解决的，而是产生了固着并深刻影响了其后人格的发展。倘若父母能够给洪秀全更多的关爱，那么洪秀全的人格也将产生很大的变化，但历史没有假设。

洪秀全对姐姐的这种依恋对其后颁布的妇女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1843年当他潜心研读了《劝世良言》之后，此书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其实不仅是在反清

的思想方面同时还有反对奸淫妇女和淫乱的思想。梁发认为：“奸恶邪淫的罪是重。盖邪淫固是一大恶，比之悖逆神天上帝，不肯尊崇之者，其恶之罪，不能胜数。”因为“奸淫之事，最容易污秽人灵”。不仅如此，梁发甚至认为“凡视看妇人致怀邪欲向之，则在心已同之行奸”，而且连“娶受休之妇，则为行奸也”（王晓南，1999）。而洪秀全向来对姐姐有着爱慕之情，同时在加上道德的不允许，使得洪秀全对于性欲有了更多的排斥和厌恶。这种对性的消极看法造成了洪秀全后期的一些变态行为。在革命初期，他首先捣毁了赐古村附近六乌山的六乌神像。相传这里供奉着一对男女，当初二人在此山，苟合而死，后人相传闻得道，故立像祭祀（史景迁，2011）。洪秀全则质疑，男女通奸怎能成仙呢。随后将其捣毁并以发泄其心中的愤恨。后来他又捣毁了象州的甘王庙，据说这姓甘之人为保家族兴旺发达，听信风水先生的话，先将其母亲杀害，后来还强迫自己的姐姐和当地的流氓通奸（史景迁，2011）。这两大庙有着共同的特点，都是乱伦之人被供奉。随后洪秀全又提诗：

题将草檄斥甘妖，该诛该灭罪不饶。
打死母亲干国法，期满上帝犯天条。
迷缠妇女雷当劈，害累人民火定烧。
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

又书《十款天条》于壁上。洪秀全这种极端心态一方面反映了他被压抑的性幻想，另一方面也投射出他借助于这种形式减轻自己的负罪感，这是一种“解消机制”（魏万磊，2004）洪秀全的这种变态行为还表现在教育儿子上，洪天贵福说他父亲“就不准我与母亲姐妹见面，老天王做有《十救诗》给我读，都是说这男女别开，不准见面的道理。”《十救诗》作为洪天贵福言行举止的金科玉律，涵盖“妈别息”、“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等“严别男女”的内容，其中有些规定近乎于荒诞无聊，如男童7岁就不能再与母亲同床，姐姐也要与他保持一丈远的距离，妹妹5岁后哥哥就不能再拉她的手（《太平天国印书》）。洪秀全的负罪感使他对儿子的管教十分苛刻。除此之外，洪秀全对性的压抑也表现在一些关于婚姻政策上。太平天国强调“一夫一妇，理所宜然”，而洪秀全在1851年就有15名后妃，到了最后竟然多达88个。洪秀全不断的为自己选妃，这种过度的选妃一方面是在极力的掩饰自己对姐姐的不正常爱欲，另一方面又为了消除自己的罪恶感。洪秀全在宣传“男女平等”时，又“要别男营女营，不得授受相亲”（《太平天国印书》）“凡夫妻私贩天条者，男女皆斩”也就是

说无论是过夫妻生活也好，两相情愿也罢，强奸也罢，只要是和异性发生了性关系，便一律属于犯下“奸淫”罪，格杀勿论(夏春涛, 2003)。唯独“只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不分男女”(吟喇, 1866/1985)。从这些例子都可看出洪秀全对性欲望的压抑和憎恨，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发现了洪秀全所追求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而是有着“男尊女卑”的思想，宗教也只不过是他的统治的一个工具罢了。洪秀全的禁欲主义，终于滋生出病态的性行为，产生了同性恋现象。时人写有“狎变童”一诗描述道：人心不同各如面，水炮不如铜鼓便。招邀游荡两雄俱，玉貌朱唇大线辫。噫嘻！老兄弟带娃崽，甘言诱之娃崽悔。少年莫逞好颜色，城外兵如城里贼(夏春涛, 2003)。足见洪秀全的政策对军民的危害有多大，洪秀全人格特征对太平天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传教期间洪秀全将他的性欲转化为对庙宇的捣毁，将内部能量转化到了外部事物上，但是很明显到了后期洪秀全深居宫中，不再过问政事，那么洪秀全禁欲的心理动力是不是就消失了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荣格提出了心理能量守恒这一原则，也就是说某一种特定的心理要素原来所固有的心理能减退或是消失，那么与此相等的心理能就会在另一心理要素中出现。这种精神能量不会白白的消失，它会从一个位置转移到另一个位置(魏广东, 2012)。例如，一个男孩如果对玩具飞机、连环画和警察与小偷的游戏都不感兴趣，那就意味着，他的兴趣和注意力将会转移到汽车、小说和姑娘们身上。心理的总能量是相对不变的，一个人的性格突然发生变化，其原因就在于心理能的重新分配。由此可知，洪秀全的心理能肯定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由于他经常在宫中，面对众多的嫔妃，他要想继续寻找发泄的对象，那么众多的后妃就是他最好的选择，同时这种心理能量已由之前的意识转移到了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洪秀全在还没有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得要死，早在 1851 年金田起义时，就发生了一起鲜为人知的后宫娘娘出逃的事件，洪在起义前从广州来紫荆山根据地途中带来一位刘姓女子，由于忍受不了洪秀全的虐待，3 月 5 日私逃回家。3 月 7 日，杨秀清就以天父名义下凡，亲自盘问刘氏。天父问刘氏和另一位娘娘潘氏是谁的妻子并是否愿意与天王有关系？她们回答是天王的妻子，与天王结为夫妻是快乐的。天父说，那你们就没有理由埋怨，并正月宫赖氏对他们进行交到，要求她悉心侍奉天王，随后对 15 为娘娘进行了集体教导。天父、天兄的这些教导，后来被洪秀全有选择地编进了《天父诗》(吴善中, 2010)。然而不久之后又传出刘氏出逃。这也从侧面可看出洪秀全虐待的残忍性。此时洪秀全的这种施虐心理还能受意识控制，能听见天父

和天兄的教诲。而到了定都之后，洪秀全的这种施虐变得更加的变本加厉，将潜意识中的道德冲突和罪恶感完全施加到了后妃身上。此时洪秀全为后妃们制定了类似的“三从四德”封建礼教的“十该打”和“四不准”等清规戒律，要求他们绝对服从他的管教，简直把她们当成奴隶。十该打是“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四不准”是“一不准多喙争骂；二不准响起喧哗；三不准讲及男人；四不准讲及谎邪(邱远猷，1991)。洪秀全已经与历史上迫害妇女的封建帝王没有任何差别，甚至更残忍，而这和他曾经倡导的“天下男女皆兄弟姊妹”更是相去甚远。

由于幼年时期的恋姐情结没有很好解决，造成洪秀全对姐姐有一种独自占有的欲望，并将这种欲望发泄在妃子们的身上。在进入南京之后，洪秀全下了一通诏旨，要臣下称后宫为娘娘，并规定后宫的姓名位次不准臣下谈论，相貌不准臣下看见，声音不准臣下外传，违者一律斩首(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1986)。攻占天京之后，洪秀全更是将他所有的“娘娘”们紧闭起来，外人（包括一人之下的东王在内）根本无法踏进太王府的门槛(李文海，刘仰东，1997)。洪秀全有着常人不可想象的独占欲，不禁让人有种“金屋藏娇”的错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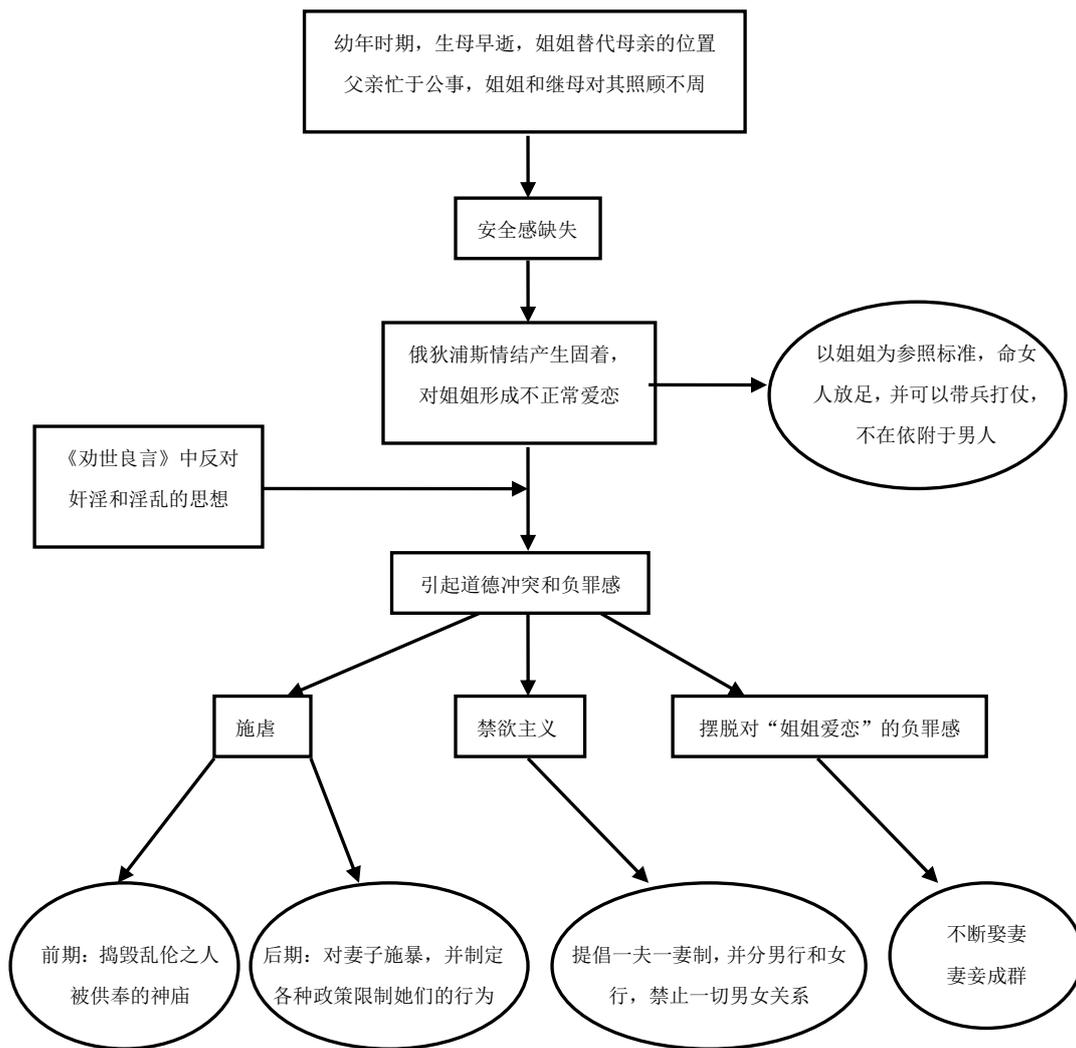


图 3：恋母情结

洪秀全在妇女政策中还提出了一些进步政策，如解除缠足恶习。洪秀全的这一政策与他是客家人有很大的关系，客家妇女都是“天足”。她们不同于清朝时期的其他地区的妇女，也不深居家中，而是同男人一样上山下地干活（何凌，2007）。从洪秀全的幼年开始，他接触最多的女人就是他姐姐。与其说是客家女人的传统是洪秀全令所有女人“天足”倒不如说是姐姐对其影响。因为姐姐的形象成为了他对女人的一个判断标准。这一政策也既满足了洪秀全对女人的审美要求，也满足了当时的生产需要。由于这种开放的政策，女军有四十军，达十万人（路平，一山，1988）。这也造就了一些如洪宣娇、苏三娘、胡大妹等女英雄豪杰。女人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综上所述（见图3），由于幼年时期的安全感缺乏，造成了洪秀全的“俄狄浦斯”情结没能很好地解决，产生了对姐姐的依恋。为了摆脱这种依恋，洪秀全一

生娶妻多达88个。《劝世良言》中对各种不伦爱情的排斥，在加上道德的谴责，洪秀全产生了对女性的扭曲和变态的心理。这种变态心理是洪秀全施虐的根源，最先是表现为对供奉乱伦之人庙宇的捣毁，到了后期转变为对妃子的各种虐待和囚禁，并且在军中严厉禁止一切男女关系。然而正是由于洪秀全以姐姐为参照标准，才促进了妇女的解放，这也是太平天国妇女政策中的进步一面。而对乱伦的恐惧导致他颁布了不符合人性的婚姻政策，此外洪秀全的变态心理还影响到了其对儿子的教育。由此可见，洪秀全在妇女政策中的革命与保守的矛盾心理的根源是安全感的缺失。

5.4 政权建设—合作的变化

阿德勒将合作视为我们拥有的可以防止精神病倾向的唯一的保证。儿童应该被鼓励及被训练以合作之道，而对合作的任何妨碍都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阿德勒, 2011)。洪秀全在政权建设方面的矛盾性正是体现了他的合作变化。关于洪秀全幼年史料是相当有限的，但是从革命初期的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洪秀全是非常懂得合作之道的。1847年，洪秀全赴广西与冯云山会合，冯云山和教众拥戴他为教主，他能很快的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教书先生转变为一个受人尊敬和敬仰的教主。他很快的加入了反清的队伍，并与冯云山一道努力将拜上帝教迅速的扩展到了紫金山区附近的各县州，甚至到了广东一带，教徒也迅速增至3万人。由此可看出，洪秀全是非常懂得怎么与人合作的，而且也能顺应时代的要求。到了永安之后，洪秀全进行了长达半年的政权建设，他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和韦昌辉分别封为东、西、南、北王，他们分别管制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各国，封石达开为翼王。杨秀清在战斗中表现出了刚强、坚毅、机智的性格，并且很善于打仗，也能顺应民心，然而洪秀全是不善于带兵打仗。因此，洪秀全规定“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将军事大权全交给了杨秀清。而冯云作为传教的奠基人，却成了天父的第四子，杨秀清之所以能很快的成为继洪秀全之下的第二重要领导人，还与他的代“天父”下凡，有着重要关系。洪秀全自命为上帝的儿子，那么作为可以代“天父”下凡的杨秀清自然也就成了拜上帝教的重要人物。而萧朝贵也同样，有着代“天兄”下凡的本领，因此成为太平天国的第三号人物。洪秀全的这些职务安排体现了他的用人之道的精明和理性。这样不但可以维持的他教主和首领的统治地位，而且还不至于揭穿他的谎言。但从他与杨秀清、萧朝贵的合作中，也多少体现出他的一些懦弱性格。每当“天父”“天兄”下凡时，

他都只有跪地听命的份，不敢有丝毫反抗。洪秀全这种合作和懦弱的性格与他在家庭中出生顺序有着密切关系。洪秀全作为家中的幼子从出生之日起，就开始与其他的孩子分享父母的注意，他身边有很多人，他比最大的孩子更容易学会合作(阿德勒, 2000)。合作使幼子顺利的成为了父母和其他人关注的焦点。史料记载，洪秀全幼年就得到了父母的偏爱。然而，幼子的处境又是非常有利的，父母兄弟都帮助他，许多人来刺激他的雄心和努力，而无人来攻击他(阿德勒, 2000)。幼子常年生活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合作能力从出生就开始了，但是由于这种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宠爱方式，也造成了幼子非常缺乏勇气(阿德勒, 2000)。幼子学会了怎么样与哥哥姐姐们争夺父母的关注，但他们却没有学会怎样更好的处理困境。传教初期，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一同传到，但是因为经受不住一系列的挫折，信心发生动摇，就返回了花县老家。除此之外，在定都天京的问题上，也可看出洪秀全缺乏勇气，他主张就在南京定都，认为从此就可以开始享受生活了。革命的胜利，让洪秀全看到了希望。但是在定都南京之后，由于洪秀全的软弱，也激发了杨秀清的篡权夺位的动机。杨秀清曾多次代“天父”下凡斥责和凌辱洪秀全。到了南京之后，这种事情发生的更加频繁。1853年11月杨秀清又借“天父”之名，指责洪任意打骂部下，要“杖责四十”，北王及众官俯伏地下哭求亦不得免，直到洪愿意俯伏受杖方罢(赵璐，乔志强, 2002)。而后，杨秀清又借“天父”下凡的名义，宣布“不可尽毁古书”，其目的是一方面为了纠正洪秀全的错误，另一方面也体现他的权力要高于天王。不仅如此，杨秀清因洪秀全的兄长洪仁发迟到而责备其“不敬，微讽于所属”(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 1986)，这是在有意向天王洪秀全表达不满，而洪秀全“闻之，内不自安”，于是下诏让洪仁发去杨秀清处“肉袒请罪”(张德坚, 1952)。杨秀清的权力欲望有加无减。在太平天国的法律条文中，就有一条说“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如敢面对行走者，斩首不留。”(张德坚, 1952)可见，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地位已经和洪秀全相差不多，并且还有着代“天父”传言的能力和很好的军事能力，照这样下去，杨秀清很可能会取代洪秀全。

这种权力的威胁对洪秀全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威胁使原本处于安逸生活中的洪秀全再次感受到了强列的不安全感。正如马斯洛所说，个体在处于权威崩溃、战争、疾病、自然灾害等危机状态时，潜意识的安全就要就会被再次激发，并成为调动机体活跃和支配的重要动力(马斯洛, 1987/2007)。由于洪秀全的不安全感和杨秀全的权力欲望膨胀，最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京事变。对这样的恶性事件，

洪不但未予制止，反而悬赏通缉石达开，以“官丞相，金六百两”的赏格“购其首级”，这些都证明至少洪对韦是持怂恿和支持态度的(赵璐，乔志强，2002)。由于长期处于权力威胁的不安全感中，因此他就借韦昌辉的手杀了杨秀清，为自己除了一个心头大患。这一事件无疑满足了洪秀全的心理需要。由于杨秀清的背叛和对其心理上造成的创伤，洪秀全的不安全感，使其一改之前的作风，不再信任任何人。他一度废除了军师，也下诏永不封王。到了后期，这种不安全感，也加重了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和顽固不化。

另一方面，不安全感的激发，进一步加重了洪秀全的自卑感。作为幼子的洪秀全除了一些懦弱之外，本身还有着很深的自卑感，因为周围的人都比他大，比他更有经验，比他更强壮(阿德勒，2000)。加上家庭的贫穷，洪秀全的自卑心理更明显。曾经她是父母的骄傲，科举的屡次失败，使他的自卑心理加重。潜意识的不安全感使洪秀全深切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再一次加重了她的自卑感。自卑感的存在使洪秀全更加注重对权力的追求(沈德灿，2005)。他为了防止权力落入他人手中，开始重用安、福二王，对于外姓将领都不再信任。虽然在此阶段洪秀全封王多达两千七百个，但是这些王形同虚设，都没有实际的权力，此时的洪秀全集权力于一身。一方面宗教可以满足他对权力的追求，这在前文已经分析过。另一方面，宗教的选择也多少满足了洪秀全对安全感的需要。“那种想用一种世界观或者宗教把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组成某种令人满意的何以和有意义的整体的倾向，多少也是出于对安全感的寻求。”(马斯洛，1987/2007)对于缺乏安全感需要的人，更倾向于一种安稳的程序或一个可以遇见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的不正义、不公正使孩子感到焦虑和不安全，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来源于不公正本身或者是不公正造成的伤害，不如说是这样的待遇让世界变的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遇见(马斯洛，1987/2007)。洪秀全正是想通过宗教来建立一个不变的社会，建立一个可以预测的社会，就如同圣经中描述的一样。而这种寻求安全和稳定的努力还表现为对熟悉事物的偏爱，对未知事物的排斥。认为“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这一思想已经深入他心。就算他不思进取，上帝也会庇护他和他的臣民。于是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越走越极端，这种信仰远远超过了他的生命，也造成他久病不医的原因和不顾战局，一味相信上帝。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行为者，除了要满足安全感的需要，另一部分也有对尊重需要的满足。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想获得别人对自己较高并且是稳定的、牢固的评价的欲望。这就是自尊，即来自于他们的尊重的

需要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实力、成就、全能优势、胜任以及面对世界时的自信、孤立、独立和自由等的欲望。第二类，是对名誉和威信的欲望，而这种需要的受挫就会产生自卑感(马斯洛，1987/2007)。拉斯韦尔曾提出，政治活动是自我满足政治行为者人格需要的方式之一，政治活动的权力动机来自补偿未被满足的自尊需要(魏万磊, 2011)。洪秀全的自卑感，还一部分来自于尊重需要的缺失。

杨秀清带给他的不止是不安全感，还有对其的权威存在的严重打击，洪秀全再也得不到之前的众人尊重。太平天国上下，对洪秀全的地位和宣扬的信仰产生了质疑。当时在军中流传这样的歌谣“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崔之清，胡臣友, 1994)面对这些，不洪秀全不得不给杨秀清平反昭雪。洪秀全为了竭力的维持自己的神权地位，他一字一句的修订了《圣经》，重新整合太平天国的神权系统。为了强调上帝无上的地位，他将国号太平天国改为“上帝天国”。不仅如此，洪秀全还对《启示录》、《创世纪》等进行了修改。在《创世纪》中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亚伯拉罕)，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洪秀全修改后是“天国之王麦基洗德带幔与酒而出，他是至上帝之祭司。”并解释说，“此麦基洗德就是朕，朕前在天上凡显此实迹，以作今日下凡作主之凭据也。”(魏万磊, 2006)显示了洪秀全不仅要在政治上回到天下共主的地位，而且自己还要担任政治上的最好祭司职位，让自己真正的“君权神授”(魏万磊, 2006)。洪秀全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再次塑造自己的威信。洪秀全集权力于一身，唯我独尊。这些都减少了他的自卑感，也满足了他的尊重需要。然而洪秀全的自尊需要是得到了满足，但是他所谓的自尊是不健康的。最稳定和最健康的自尊是建立在当之无愧的来自于他人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外在的名声、声望以及无根据的奉承之中。而这种不是基于自己真实能力的自尊是危险的(马斯洛，1987/2007)。这种不健康的自尊需要蒙蔽了洪秀全的双眼。在众多将领中，洪最宠和信任的外姓人是蒙得恩，这是一个除了阿谀奉承、拍马屁之外一无所有的人物。而这样的人，却当上了军中主将兼正掌率，甚至李秀成、陈玉成等人都要听他的指挥，最后搞得朝中“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王戎笙，龙盛运，贾熟村，何龄修, 1986)。

尊重需要的缺失加重了洪秀全的自卑感和对权力的追求。但这种需要并不是他人格形成的唯一动力。程德鹏在《再论洪秀全的矛盾人格》中重点论述了尊重需要受挫对洪秀全的人格形成的影响。认为洪秀全的“异梦”来自于尊重需要的受挫。本研究不支持这种观点。本研究认为洪秀全的“异梦”主要来自于他的本

能，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但是在平时里又不能发泄出来，最后转化为梦的形式。在洪秀全的梦中，他重点描述了自己怎么杀妖，这妖就代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清朝腐败官员。另外洪秀全参加科考的动机是为了光宗耀祖，而且在18世纪末期至19世纪中期，清王朝的统治日趋腐朽和衰败，农民生活贫困潦倒，各地起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他的所谓的光宗耀祖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满足生活上的物质需要，而不是尊重的需要。但是尊重需要的确是洪秀全保守人格形成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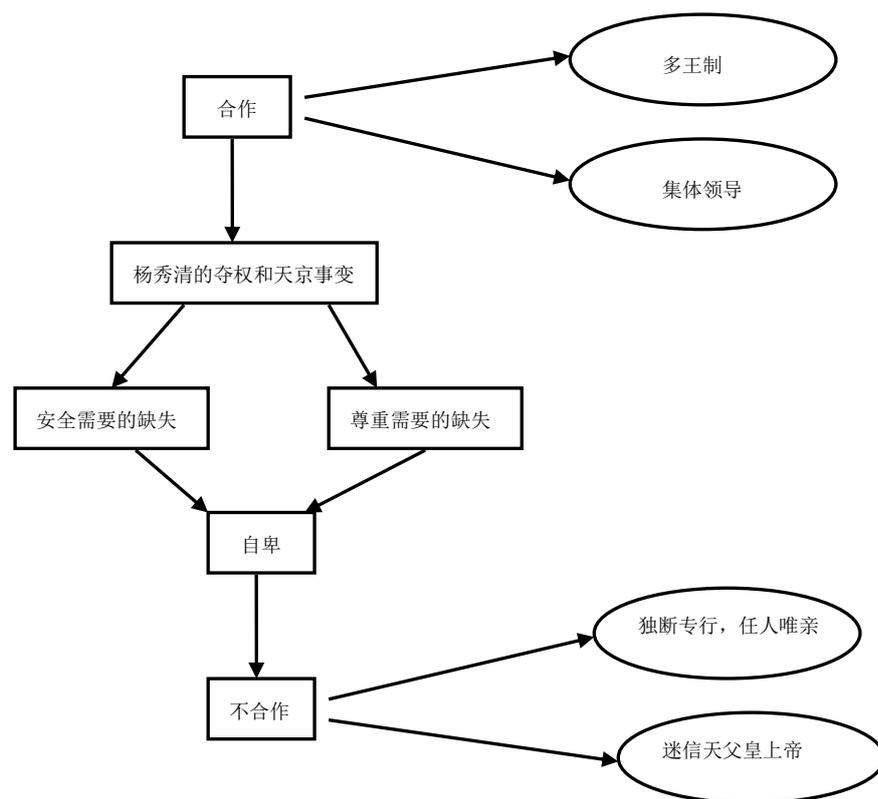


图4: 合作的变化

综上所述(见图4)，洪秀全在政权建设方面由之前的多王合作变为不合作的心理动力是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受挫的结果。由于杨秀清的权力欲望的膨胀，最后导致了天京事变。在天京事变中，虽然洪秀全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更大地激发了他潜在的不安全感和尊重需要的受挫。安全感的缺失和尊重需要的受挫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自卑。为了弥补自卑，他对权力的追求更加的变本加厉，不顾军中的反对，独断专行，任人唯亲。洪秀全自天京事变之后也一改之前的作风由先前的进步和革命转向了封建和保守，而这种变化是太平天国由胜而衰的主要原因。

5.5 小结

通过对洪秀全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洪秀全的矛盾人格的心理动力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见图5)。洪秀全在宗教的选择方面，是自我调节的结构，为了满足本我的需求，降低个体的焦虑。而到了后期，宗教则是为了满足他的统治需要。在生活风格和妇女政策方面的变化则是由于其幼年时期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缺失造成的。生理需要的缺失造成了他对物质的过分追求，随着太平天国经济的增长，他的物质欲望也在不断的膨胀。然而幼年安全的缺失造成了他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使他对姐姐有着不同寻常的爱恋，在加上《劝世良言》中对奸淫和淫乱思想的反对，引起了他的道德冲突和负罪感。最终导致了他对妇女政策的各种矛盾行为。在政权建设方面，他由之前的多王合作变为独断专行，其实质是因为潜意识中的不安全感被激发和尊重需要受挫。在革命初期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是洪秀全人格的主要心理动力。随着革命的发展，尊重需要逐渐成为人格动力的一部分。人格心理学家默里提出“需要等同于驱力，并且需要可以组成各种核心结构，而这些核心结构就是人格的核心成分。”(艾伦, 2006/2011)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尊重的需要构成了一种核心结构，这些构成了洪秀全革命与保守性矛盾人格的核心成分。因此说，洪秀全矛盾人格的心理动力受需要的满足状况影响。

6 研究三：洪秀全矛盾人格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

6.1 代际影响

由前文分析可知，洪秀全在第一阶段更多的表现出了保守性的人格特征。这种保守的人格特征集中体现于他对通过科举考取功名的向往。在最后一次科举失败时，他喊出了他的心声，是要自己开科取士。虽然科举给他的身心都带来了很大的痛苦，但他并没有要取消这种制度，而是要自己作为为主宰者，讲这种痛苦施加于别人身上。由此可见他的这种科举意识已经根深蒂固的存在于他的内心。杨玉荣(2004)将他的科举意识称为“科举情结”，情结往往是由个人情感的经验中的一个更重大伤害而产生的，这种伤害被埋进潜意识中，会在人的意识中固着一个特殊的观念形式(魏广东, 2012)。科举确实是给洪秀全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但是他没有想要取消考科举，可以看出洪秀全反对的并不是科举本身，而是想要消除自己的痛苦。科举制依然存在，只是换做了不同的人来承受它。1851年10月，太平天军攻克第一个州城安州，洪秀全就迫不及待的组织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其考试形式仍是按照传统的科举考试的八股帖制，但内容是考太平天国的官方文献。他的第一次科举与清朝的科举没有大的区别，换汤不换药。定都南京之后，他又将科举制度确定为县试、省试、京试三级考试制度。清朝的考试也是三级制，乡试、会试、殿试。这种考试制度和传统的科举极其相似，只是考试的内容不同而已。另外太平天国又特设了女科举，开自己自问鼎科举之先河。洪秀全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提出了很多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改信基督教教义，但是这种科举的思想却始终没有改变。

洪秀全这种保守的行为也表明了他对这种制度的持赞成的态度，而他对科举的这种态度主要还是来源于其祖辈的影响。洪氏家族的族谱中有一副对联，勾勒了洪氏家族的繁衍生息的轨迹(王庆城, 2010)：

由嘉应徒杨梅，祖德宗功，经之营之，力图官禄之基础；

籍花峰贯花邑，光前裕后，耕也学也，恢复敦煌之遗风。

这幅对联中“耕也学也”就是勤耕苦读的意思，这是农民社会的一般中国家庭所崇拜的人生模式，就是在强调耕地的同时，也要寒窗苦读，就是为了取得功名，光宗耀祖。今花县洪氏族谱，以洪皓为远祖。洪皓二十八岁中进士，建炎三年(1129)五月，擢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为金通问使，龚畴副之。“皓长子适，字景伯，幼敏悟，日诵三千言。其父使朔方，适年甫十三，能任家事。绍兴十二年(1142)，与弟

遵同中博学宏词科。高宗说，皓在远方，子能自立，以忠义报也。遂除救令所删定官。后三年，弟遵亦中是选。由是三洪文名满天下。洪皓三子，长适、次遵、三迈，皆任途显考，而遵名尤著。其族人在朝为官者八十余人，可谓书香世家，阀阅贵冑。适子樱，十五传而至念九郎，原居广东潮州府，后迁嘉应州，其子孙复散居广东各地。再由念九郎经十一传而至讼三。讼三生五子，长英经，次英纶，三英赞，四英斌，五英纬。五子中次子英纶和五子英纬，最初迁居于花县，以耕种为生。由纶房再传而至十四世祖国游公。公生子多人，次子名镜扬，是为十五世祖，即天王洪秀全之父。”（张杰，1995）洪秀全的远祖洪璞即曾在难从绍兴年间高中进士，官授附件泉州晋江江尉。

由此可看出洪氏家族一直以来都是通过参加科举来荣耀家族的，然而到了洪秀全的父亲洪镜扬却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拥有夯土房屋数间，田数亩，耕牛两头。洪秀全的两个哥哥一直随父务农。显然，洪镜扬若想“光前欲后”，重振祖先遗风，希望只能寄托在幼子洪秀全身上（夏春涛，1992）。其实在封建社会，不仅洪氏家族是这样，多数家庭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如《礼记》所说“七年小城，九年大成。”就是说约在15岁时就可以参加科考了。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根深蒂固于每一个农民家庭。这种方式其实是人们长期发展遗留下来的。这是历史留给人们的产物，这种“原始遗存物”被荣格称之为“原型”。所谓原型不是“一个遗传的观念”，而是“一种遗传的功能方式”，其实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一种“行为模式”（魏广东，2012）。这种原型之所以遗留下来，是因为它利于个体也有利于种族，否则它就不能成为人们的固有天性（魏广东，2012）。确实是，这种方式既满足了洪秀全的欲望，又满足了整个家族的利益。而这种原型确实是一种本能的趋向，它没有已知的渊源，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它们都是重复现身（荣格，2014）。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现代人的思想中，人会有着“学尔优则仕”的思想。这种原型并不是但在洪秀全一个人身上的。原型主要来自集体潜意识，它是一种记忆的沉淀（荣格，2009），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记。

洪秀全的家族向来都是以考取功名的方式来荣耀家族，这种功能被世代遗留了下来，可以说是祖先们留给洪秀全一种集体潜意识，深深的影响了洪秀全，以至于后来，洪秀全当了天王之后，自己还要采取这种方式来选取人才。

6.2 家庭影响

提到太平天国运动，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就是曾国藩，洪秀全建立了太平天国，最终被曾国藩所打败。曾国藩和洪秀全有着相似的童年经历，但是他们却有着不同人格特征(见表5)。曾国藩同样也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曾氏“累世业农”(牛贯杰, 2010)，是家中的长子，有四个弟弟。曾国藩从十四岁(1824年)就开始参加科举考试，屡试屡败。直到1830年，曾国藩才考中秀才。曾国藩之所以成为传统社会典型的文人将相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具有的儒家道德观念中的理想个人魅力(牛贯杰, 2010)。曾国藩任劳任怨，不能有过一点非分之想。曾国藩的性格倔强，坚强，敢与困难周旋，这种性格是继承了母亲的性格。洪秀全在幼年就丧母，母亲对其的影响是没有的，母爱的缺失，对洪秀全懦弱，自卑的性格也有着很大的影响。洪秀全幼年的自卑除了有家庭的贫困，还有母爱的缺失。从人格心理学的角度讲，母爱的缺失会造成儿童人格的不完善。

曾国藩的政治人格是保守的，而洪秀全则是既革命又保守的矛盾人格。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的萨洛韦(Frank J.Sulloway)曾提出，在一个家庭中，不同的出生顺序对个体的人格有着不同的影响。家长中长子有着较保守的人格特征，他们对于思想和政治的变革持抵制的态度。而幼子则不同，他们有着较开放性、革命性的人格特征。他们乐于体验新鲜事物，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家庭中的出生次序影响了一个人的人格特征。这是因为在同胞之间也会存在一个相互竞争，他们都力争从父母那里获得物质、情感和理性方面的资源。不同的出生顺序为他们在家庭中创造了不同的角色。而这些不同的角色又会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向父母求宠。“例如，老大很有可能通过对弟妹们充当代理父母来求宠与父母，而他们的弟妹们则以不同的方式讨好父母。”(萨洛韦, 1996/1999)幼子与长子相比，幼子的行为较少受父母的影响，也较少有责任感的驱使。随着孩子们的成长，老大就更趋向于对父母和权威的认同，并且更加的顺从、保守，善于采取防御的姿态。而幼子更趋向于开放、反叛，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19世纪30-40年代，萨洛韦(1996/1999)对拥护进化论的思想做了一个比数调查，发现后出生拥护进化论思想时头出生者的9.7倍。随后，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均证明了后出生者比头出生者更具有革命性的特征。曾国藩作为家中的长子，虽然他很勇敢，不惧困难，但是在政治改革和建设还是持保守的观点，他就是萨洛韦理论中的典型长子。但是洪秀全作为家中的幼子，不但有着革命性的人格特征，还有保守性的人格特征。这与他的父母教教育和在家中的地位有着密切联系。

作为幼子的洪秀全自幼好学，而两个哥哥又不学无术，因此父母逢人就会提

起他来，无形中将他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而洪秀全也以长子的身份自居，时刻谨记父母的教诲，以完成父母的期望为己任。正是这种长子的身份造成了洪秀全懦弱的性格，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但这也使洪秀全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偏爱。这种过分的爱和长子的认同使洪秀全形成了保守的人格特征。

家庭是影响孩子的一个最主要的环境。哥哥们的影响和父母的偏爱，造就了洪秀全既革命又保守的矛盾性人格特征。

表5：洪秀全与曾国藩的比较

	洪秀全	曾国藩
父母	生母早逝	父母俱在
家庭条件	农民家庭，以农为生	农民家庭，世代为农
人格特征	革命和保守的矛盾人格	典型的保守型人格
家中排行	幼子	长子
出生时间	1814年	1811年
参加科考的年龄	十六岁	十四岁
参加科考的次数	曾四次参加科考	曾七次科考，才中秀才

6.3 重要他人

重要他人是指对个体的全面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群体和个人，这些人对个体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对个体的发展起过巨大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作用的人物(顾明远, 1992)。重要他人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同伴，抑或是萍水相逢的人。重要他人可以影响个体的目标行为和自我管理。个体和重要他人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依恋的形式反映出来的(胡小勇, 车璐, 郭永玉, 2013)。依恋可以被看做是一种产生于某种条件下的，作用与许多情景中为了完成依恋目标以及所采用的行为之间的一种内部心理表征。依恋其实类似于一种目标—行为系统，目标是追求“安全感”。重要他人就是通过这种“依恋模式”来影响个体的人格发展。

对洪秀全的矛盾人格形成重要影响的重要他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冯云山和杨秀清。冯云山和洪秀全有着相似的经历，但是冯云山家庭条件要比洪秀全好些。他们志同道合，都对清政府的统治非常不满。他和洪秀全一起去传教，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放弃。而且，当洪秀全再次去找他时，他和教众继续拥戴洪秀全做教主。可以说，洪秀全对他是有着很大的依恋，而这种依恋显然是安全的依恋。就像是亲子关系一样，不管你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母亲都会原谅你。冯云

山满足了洪秀全所需要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对洪秀全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在初期，洪秀全的性格特征相对稳定。正是因为冯云山的不离不弃进一步激发了洪秀全的革命性人格特征。而洪秀全很多进步的政策都是和冯云山一起制定的。冯云山就像一个慈祥的母亲一样影响着洪秀全。

杨秀清对洪秀全的人格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杨秀清英勇善战，如果说冯云山像母亲，那么杨秀清就像是父亲一样。显然杨秀清是一个力量型的人物，他也能给人以安全感。在战中，杨秀清更像是军师般指挥军民英勇奋战。起初，洪秀全也是完全信任和依赖他的。洪秀全将朝中各事全部交给东王。就像一个幼儿般的期望，“父亲”可以帮我做任何事情。而且，杨秀清还有着代“天父”传言的本领。于是，在潜意识里，洪秀全已经对杨秀清产生了像“父亲”般的依恋。但是随着杨秀清的权力欲望增加，他带给洪秀全不再是安全感，而是威胁感，就像是“俄狄浦斯”情结中，杀父的少年一样。洪秀全纵容了韦昌辉的行为。虽然杨秀清不在了，但留给洪秀全的威胁感直到洪秀全死的那一刻都是存在的。杨秀清的变化，使洪秀全的行为变得更加矛盾，更加怪异。再次激发了洪秀全潜意识里的“不安全感”，同时他的人格特征再次倾向于顽固保守性。

6.4 环境影响

个体的发展永远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环境对个体的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就像一个温床一样孕育了每个人的不同人格特征。

洪秀全出生地是广西，广西在江南各省中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区，江南各省位于长江中下游，土地肥沃，农民生活优越。但是广西则不同，处于南疆，土地贫瘠。在当时清朝的公私文件中，只要提到广西，肯定离不了“粤省穷荒，天下所闻”“地瘠民贫”“瘠苦慳嗇之区” 《太平天国运动史》。

然而除此之外，道光十四年、十五年连年蝗蝻，飞蔽天日，道光十年，地震，自春间不雨，道光十九年，淫雨连日（《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关系农民起义资料》）。广西地区几乎每年都有不同的自然灾害，本来土地就不肥沃，再加上自然灾害，人民的生活自然苦不堪言。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自然使得人民对物质的需要变的更为突出，自然对洪秀全的保守性人格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

当时的社会环境肯定也会影响洪秀全的矛盾人格。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地，居中的居民中不仅有壮族、瑶族、苗族等十多个名族，而且还有大量的广东、

湖南、福建等地的客家人。这就导致了广西的社会矛盾异常复杂尖锐。而且广西还被称为多“盗”之都，历来是被压迫阶级反抗斗争比较剧烈的地区。鸦片战之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苛捐杂税的增多，使广西农民发生了多场起义，例如当时最大的起义有天地会的起义，他们打着“替天行道”“反清复明”“劫富济贫”的宗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关系农民起义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 1847 年到 1850 年，广西的农民起义就多达到二、三十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关系农民起义资料》)。在金田起义之前就有白莲教的起义、雷再浩、李世德和李沅发起义、陈阿贵起义等等。这些思想无疑对洪秀全的革命性人格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在加上清政府对待各民族和起义的镇压政策，必然得的农民更加的愤怒。然而所谓物极必反，这种强大的镇压政策无疑对洪秀全的起义起到了推动作用。

6.5 小结

洪秀全矛盾政治人格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有代际、家庭、重要他人和环境的影响。由于家族世代的影响，使得科举考取功名的思想深植于洪秀全的内心，这必然造成了幼年的洪秀全对封建传统思想深信不疑。然后加之父母的教育，和哥哥们的不学无术，使洪秀全直接成为了封建士子的代表。这些都促使他形成了保守性的人格特征。随着社会的变化，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各地起义不断，加之自己的失败，激发了洪秀全的反抗和革命的潜意识。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冯云山和杨秀清则成为他人生中的重要他人。自卑、懦弱、好胜心使得洪秀全时而表现保守的人格特征，又时而表现革命性的人格特征。因此由于这些外部的影响因素促使了洪秀全形成了既革命又保守的矛盾人格。

7 总结

政治人格之所以作为政治心理学的主要内容，是因为政治人格直接影响政治者的政治行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有了人，就有了政治世界，而人又不是抽象的行为体，也不是机器，所以政治人的七情六欲，构筑了丰富多彩、光怪陆离的政治生活(格林斯坦, 2000/2013)。本研究通过三个部分详细的分析了洪秀全的政治人格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其矛盾政治人格形成的心理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洪秀全是近代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晚清王朝和外国列强在中国的统治以沉重打击。他吸收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创立了拜上帝教，提出人人平等，天下皆为兄弟姐妹，然而他又同时制定了各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以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他一方面借助拜上帝教的进步教义吸收教徒，另一方面又利用教义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不断的宣扬他的君权神授。他的种种矛盾行为主要是来自于他人格中的矛盾性。在研究一中首次将量化研究引入到了政治人格的研究中，利用特尔菲法验证了洪秀全同时具有革命性和保守性的矛盾人格。其革命性的人格主要表现为上进性、好胜性和反抗性；保守性的人格主要表现为迷信性、腐败性和奢侈性。然后利用心理传记法对洪秀全的一生进行详细分析，可得出洪秀全革命性的人格特征促成了一些进步的政策、纲领的制定，使太平天国运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并且迎合了广大军民的需求；然而保守性的人格特征一方面瓦解了领导者的内部统治，在领导者中滋生了严重的腐败、奢侈行为，另一方面使广大军民逐渐对领导者产生了不满，造成了广大军民的人心混乱，最终使太平天国走上了灭亡的道路。因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洪秀全的矛盾人格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成败。

在研究二中，全面的分析了洪秀全矛盾性格形成的心理动力。在此，根据洪秀全一生的主要事件，将洪秀全的一生分为：宗教思想、个人生活、妇女政策和政权建设四个方面。初期由于洪秀全的多次科考失败，产生了对清王朝的愤恨，使内心处于焦虑和不满的状态。洪秀全为了消除焦虑，选择了符合自己心声的基督教教义，由之前对儒家思想的迷信转变对为基督思想的崇拜。通过宗教的选择这种自我调节的方式，使本我、自我和超我都达到了一定的满足并符合当时现实的需要。到了后期宗教又成为了他权力追求的一种方式，也过分的满足了其幼年时期缺失的安全需要。幼年的洪秀全由于家境的贫寒，物质生活极度的匮乏。这

种需要的未满足造成了后期的洪秀全对物质生活的极度追求。由于洪秀全地位的变化和太平天国胜利的取得，经济条件的允许，他的生活风格也由之前的追求社会动机变为过度追求个人动机，生活也由之前的艰苦朴素转变为奢侈腐败。幼年的秀全不仅家境贫寒而且母亲早逝，姐姐则取代了母亲的位置，而姐姐显然不能很好的完成母亲的角色。幼年时期安全感的缺失导致洪秀全“俄狄浦斯”情结的固着，最终造成了洪秀全的虐待心理和对待妇女的各种矛盾行为和政策。天京事变之后，杨秀清的背叛更是造成了洪秀全内心的不安全感和尊重需要的受挫。他开始独断专行，任人唯亲，以此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和尊重需要的满足。纵观洪秀全的一生，需要的满足构成了其人格的心理动力。他一生都在不断的追求对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和尊重需要的满足，而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则是最主要的心理动力。然而拉斯韦尔认为尊重需要是每一个领导者政治活动的基本前提(魏万磊, 2011)，显然洪秀全的心理动力不用于其他的领导者。正是由于不同的心理动力造成了洪秀全革命的不彻底性，所以说洪秀全只是属于革命者中的反叛者。

人格的形成除了自身的心理动力之外还有外部的影响因素。在研究三中主要从代际、家庭、重要他人和环境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从洪秀全的家谱可发现洪秀全的家族世代以科考为生，到了父亲这一代开始以农为生。这种“学而优则士”的思想作为原型，深深影响了幼年的洪秀全，造成了他的“科举情结”。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儿童的影响则固然很重要。由于哥哥们的不学无术和洪秀全的聪明好学，自幼父母就对其溺爱有加。这种溺爱的教养方式造成了洪秀全的不自信和懦弱，影响了洪秀全革命的不彻底性。除此之外同伴的影响也是个人人格形成的一个主要方面。冯云山和杨秀清是洪秀全的重要他人。冯云山像慈母一般，而杨秀清则像严父一般影响着洪秀全的人格。使洪秀全时而表现出革命性的人格，时而又表现出保守性的人格。再加之当时环境的影响，社会的动荡不安，自然灾害连续不断，人们的生活贫苦潦倒。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洪秀全由于自己的失败，更是产生了对社会的不满。这些外在的影响因素都像催化剂一般影响了他的矛盾人格形成。

本研究作为政治人格研究的一部分，一方面丰富了国内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另一方面采用了质量相结合的心理传记法，也完善和充实了国内心理传记的发展。通过对洪秀全的人格分析，对于现代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政治人格提供了指导。无论家庭和出身如何，每一个人只要努力并很好的利用身边的有利条件，学会与人合作，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实现“成为尧舜禹”的梦想。洪秀全的例子不

仅给我们以鼓舞,也给我们以借鉴,更是有利于普通大众的理想政治人格的塑造。一个人若一味的追求个人利益,则必然会导致失败。另外作为父母也要以正确的教养方式对待孩子,不能过分溺爱也不能过分严厉。此外,本研究也为历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贡献一份力量。

8 本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试图通过洪秀全的个案研究，系统的分析政治人格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及形成原因，然而本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重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个体的人格特征渗透于个体行为的方方面面，本研究结合可靠地是史料分析了人格对行为的影响。但是毕竟作为一名心理专业的学生对于历史资料的掌握还是略显薄弱。因此本研究的分析也很难确保对历史事件分析的完整而无遗漏。

另一方面，人格形成的心理动力和影响因素也是很多的，本研究基于心理学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史料，完成了对洪秀全矛盾人格的成因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但是这些解释是否穷尽了洪秀全人格形成的所有原因，却是难以定论的。一方面由于史料的难以考证，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的学识和能力有限。因此本研究作为探索性研究，其研究结果还有待进一步验证。

最后本研究通过对洪秀全政治人格的个案分析，也充实了国内关于政治人格的研究。虽然个案研究的推广性不大，但正是这一个个的个案研究奠定了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弗洛伊德通过对每个病人的个案分析提出了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埃里克森通过对青年路德、甘地等人的个案分析，提出了“同一性”危机理论和个体发展的八个阶段。个案研究作为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不容忽视。因此也希望通过本研究为人格心理学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更是为现代人们关于政治人格的塑造提供一个参考。

英文参考文献

- Capps, D. (2006). The “reversal of generations” phenomenon as illustrated by the lives of John Henry Newman and Abraham Lincoln. *Pastoral Psychology*, 55(1), 3-25.
- Elms, A. C. (1988). Freud as Leonardo: Why the first psychobiography went wro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56(1), 19-40.
- Falk, A. (2007). *Napoleon against himself: a psychobiography*. Pitchstone Llc.
- Falk, A. (2010). *The Riddle of Barack Obama: A Psychobiography*. ABC-CLIO.
- Farnham, B. R. (1997). *Roosevelt and the Munich Crisis: A study of political decision-making*.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Fitch, T., & Marshall, J. (2008). A Comparative Psychobiography of Hillary Clinton and Condoleezza Rice. *Online Submission*.
- Fouché P., & van Niekerk, R. (2010). Academic psychobiography in South Africa: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40(4), 495-507.
- Friedlander, S. (1978). *History and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Jervis, R. (1997).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nason, P. K. (2014).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1, 181-184.
- Jones, P. & Hudson, J. (1996). *The quality of leadership: A case study of John Majo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229-244.
- Kasher, A. (2006). *King Herod: a persecuted persecutor: a case study in psychohistory and psychobiography* (Vol. 36). Walter De Gruyter.
- Langer, W. C. (1972). *The mind of Adolf Hitler: The secret wartime report* (Vol. 1972).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sswell, H. D. (1930) *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cAdams, D.P. & Ochberg, R.L. (1999). *Psychobiography and Life Narrativ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63- 64.
- McAdams, D. P. (2010). *George W. Bush and the redemptive dream: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nroe, K. R. (Ed.). (2002). *Political psychology*. Psychology Press.

- Pancer, S. M., Brown, S. D., & Barr, C. W. (1999). Forming Impressions of Political Leaders: 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 *Political Psychology*, 20(2), 345-368.
- Sina, A. (2008). *Understanding Muhammad*. Felibri. com.
- Strachey, J. T. (1976).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The Pelican Freud Library, Vol.4.
- Volkan, V. D., Itzkowitz, N., & Dod, A. W. (1997). *Richard Nixon: A Psychobiograph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Wu, J. X., & Cao, W. W. (2011). Ma Yinchu's Personality and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n appl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scale analysis. In *Control, Automation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CAS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EEE. 285-288.

中文参考文献

- 阿德勒, A. (2000). *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 (周朗 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社.
- 阿德勒, A. (2011). *超越自卑* (黄光国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 艾伦, B. P. (2006/2011). *人格理论: 发展、成长与多样性 (第五版)* (陈英敏, 纪林芹, 王美萍, 王鹏, 常淑敏, 杜秀芳等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安文铸. (1990). 教育预测中的特尔菲法. *中小学管理*, 6, 014.
- 布兰察德, W. H. (1984/2004). *革命道德: 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 (戴长征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 陈德鹏. (2007). 再论洪秀全的人格心理. *安徽史学*, (3), 101-107.
- 陈徽言. (1952). 武昌纪事.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军, 刘奎. (2005). 关于洪秀全早年思想的两个问题. *龙岩师专学报*, 23(1), 95-98.
- 陈萍萍. (2006). 离异与回归: 太平天国文化冲突现象透析.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3), 90-93.
- 陈瑶姬. (2013). *心理传记视角下的毛泽东*(Master's thesis, 南京大学).
- 崔之清, 胡臣友. (1994). *洪秀全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崔之清. (2002). *太平天国战争全史*.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戴斌荣. (2005). 定量与定性结合——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
- 丹涅特, T. (1959). *美国人在东亚* (姚曾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单志艳, 孟庆茂. (2004). 心理学中定量研究的几个问题. *心理科学*, 25(4), 466-467.
- 董蔡时. (1980). 试论太平天国政权的特点和性质. *江苏师院学报*, 2, 005.
- 多伊奇, (夏伯铭 译). (1984). 什么是政治心理学.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 6, 12-14.
- 恩格斯. (1959). 德国农民战争. 见 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全集: 第七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 (1959). 国际述评. 见 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全集: 第七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恩格斯. (1959).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见 人民出版社, *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二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弗洛伊德, S. (1938/1987). *精神分析纲要* (刘福堂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弗洛伊德, S. (1900/1987). *梦的释义* (张燕云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格林斯坦, F.I. (2000/2013). *总统风格: 从罗斯福到奥巴马(第三版)* (李永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葛荃. (1991). 君子小人辨: 传统政治人格与君主政治. *天津社会科学*, (4), 44-50.
- 葛荃. (2008). 作为政治人格的狂狷, 乡愿与伪君子——以晚明东林诸君见解为据. *东岳论丛*, (6), 133-138.
- 龚蓉蓉. (2006). 政治人格: 具体的政治文化特质. *陕西教育(理论版)*, (12), 10-11.
- 顾明远. (1992). *教育大辞典(第六卷)*.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广东省太平天国研究会, 广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 (编). (1985). *洪秀全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西师范学院历史系. (1976). *金田起义*.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郭本禹. (2009). *潜意识的意义—精神分析心理学(上)*.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 郭毅生. (1981). “太平玉玺”考释. *历史档案*, 1, 019.
- 郭毅生. (1991). *太平天国经济史*. 南宁: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 郭颖. (2009). 容闳政治人格分析. *学术论坛*, (11), 160-165.
- 郭蕴深. (2001). 也评洪秀全. *黑龙江社会科学*, (4), 48-53.
- 郭周卿. (2013). *卢梭政治人格思想研究*. (Master's thesis, 云南大学).
- 韩品峥, & 方久忠. (1981). 天京事变与石达开的出走. *历史档案*, 1, 006.
- 韩山文, (简又文 译). (1952). 太平天国起义记.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何凌. (2007). *太平天国的妇女政策*. (Master's thesis, 湘潭大学).
- 何琴. (2013). *论曾国藩的行政人格*. (Master's thesis, 南昌大学).
- 洪鹏. (2007). 人格与政治行为之关系探微—基于政治心理学视角下的一种考察. *法制与社会*, (11), 510-512.
- 胡小勇, 车璐, 郭永玉. (2013). 依恋类型在重要他人影响目标追求过程中的调节作用. *心理与行为研究*, 11(5), 679-684.
- 胡志, 周达生. (1989). 软科学直观预测技术特尔菲方法. *医学与哲学*, 10(10), 2.
- 黄颂, 严正明. (1997). 竭忠诚以事君, 伏清白以死直—屈原政治人格初探. *天津师大学报*, (5), 32-36.
- 黄文英. (1952). 黄文英自述.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简又文. (1962). *太平天国典制通考(上)*. 香港: 猛进书屋.
- 简又文. (1962). *太平天国全史*. 香港: 猛进书屋.
- 蒋云根. (2002). *政治人的心理世界*.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勒庞, G. (1913/2004). *革命心理学* (佟德志, 刘训练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13)
- 李爱军. (2008). 斯大林政治人格的成因探析.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8), 22-25.
- 李文海, 刘仰东. (1997). 太平天国时代的妇女.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 010.
- 李晓芸, 张平. (2007). 政治领袖的政治人格及其生成机制探讨. *世纪桥*, (8), 6-7.
- 廖胜, 王晓南. (1999). 天京事变的个体心态探由. *天府新论*, (6), 84-89.
- 呤喇, A. F. (1866/1985).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 (王维周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刘继林. (2010). 从“拜上帝教”看洪秀全对中西文化的态度. *襄樊学院学报*, 31(10), 180-84.
- 刘松阳, 刘峰(主编). (1991). *政治心理学*.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 路平, 一山. (1988). 论太平天国妇女地位演变. *南都学坛(社会科学版)*, (4), 63-68.
- 罗尔纲. (1956). *太平天国文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罗尔纲. (1979). *太平天国史事考*. 北京: 三联书店.
- 马瑞. (1995). 梁漱溟的儒家政治人格及其社会实践. *史学月刊*, (5), 107-108.
- 马斯洛, A. H. (1987/2007). *动机与人格(第三版)* (许金声等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毛泽东. (1991) 论人民民主专政. 见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茅家琦. (1984). *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 人民出版社.
- 牟安世. (1979). *太平天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牟安世. (1979). *太平天国*.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牛贯杰 (主编). (2010). *曾国藩*. 郑州: 大象出版社.
- 潘旭澜. (2005). 还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探索与争鸣*, (9), 10-13.
- 裴士连. (2006). 政治社会化视域中的青年军官政治人格塑造. *理论建设*, (2), 72-75.
- 彭大雍. (1982). *洪秀全传*.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 彭国兴. (2002). 洪秀全的封建情结及其恶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2(1), 66-70.
- 邱远猷. (1991). *太平天国法律制度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任丽萍. (2004). 从传统到现代: 政治人格的塑造与政治稳定. *求索*, (1), 83-85.
- 荣格, C. G. (2009). *心理类型* (吴康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荣格, C. G. (2014). *潜意识与心灵成长* (张月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 阮荣平, 郑风田, 刘力. (2013). 宗教信仰选择: 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 *社会*, 33(4), 193-224.
- 萨洛韦, F. J. (1996/1999). *天生反叛* (曹精华, 何宇光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桑国宽. (1998). 试论毛泽东的政治人格. *晋阳学刊*, (4), 15-19.
- 沈德灿. (2005). *精神分析心理学*.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 史景迁, J. D. (2011). *太平天国* (朱庆葆等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舒跃育. (2010). 心理传记学研究现状, 存在问题及展望.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31(2), 28-32.
- 舒跃育. (2014). 心理传记: 架设在普通人和伟人之间的桥梁. *心理技术与应用*, (1), 63-64.
- 斯通, W. F. (1987). *政治心理学* (胡杰译).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苏双碧. (1984). *太平天国史人物论(增订本)*. 福州: 福建省人民出版社.
- 孙菁, 吴继霞. (2014) 蔡元培人格特质及其对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 *心理学进展*, 3, 1-8.
-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编辑组 (编). (1978).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 北京: 中华书局.
- 太平天国今天起义三结合编写组(编). (1975). *太平天国金田起义记*.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 (1961). *太平天国印书*.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 汤舒俊, 郭永玉. (2011). 张居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解析. *心理学探新*, 31(3), 209-213.
- 田印红. (2007). 创造性自我与生活风格—论阿德勒的人格发展观. *铜仁学院学报*, 1(3), 65-66.
- 汪堃. (1952). 盾鼻随闻录.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王富伟. (2012). 个案研究的意义和限度. *社会学研究*, 5, 161-183.
- 王慧然. (2001).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人格解析. *黑龙江社会科学*, (1), 46-49.
- 王丽萍. (2002). 政治与人格: 政治心理学领域核心关系分析.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9(2), 15-23.
- 王龙. (2013). 洪秀全的权力人格缺少什么. *同舟共进*, (3), 65-68.
- 王明前. (2005). 太平天国政治的文化继承. *学术探索*, 5, 106-103.
- 王庆成. (1985). *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 北京: 中华书局.
- 王世明. (2013). *双重身份认同的矛盾与超越: 苏轼心理传记学研究* (Master's thesis, 闽南师范大学).
- 王晓南. (1999). 《劝世良言》与洪秀全的早期妇女思想. *绵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18(4), 60-64.
- 王戎笙, 龙盛运, 贾熟村, 何龄修. (1986). *太平天国运动史*.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魏广东. (编). (2012). *心灵深处的秘密: 荣格分析心理学*.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魏冉. (2013). *自体心理学视角浅析萨特人格形成*. (Master's thesis, 南京师范大学).

- 魏万磊. (2004). 十字架下的冲撞与撕裂——洪秀全政治人格分析. *清史研究*, (4), 33-45.
- 魏万磊. (2006). 太平天国败亡的集体心理分析. *史学月刊*, (10), 30-35.
- 魏万磊. (2007). 洪秀全久病不医的精神分析. *长江论坛*, (2), 86-91.
- 魏万磊. (2011). 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研究与精神分析法. *浙江社会科学*, (2), 25-32.
- 吴继霞, 曹莉萍, 朱浚溢. (2012) 大学名校长之唐文治: 一种心理传记学的探索. *生命叙述与心理传记学*. 台湾: 龙华科技大学.
- 吴继霞, 冷洁. (2014). 对不同类型传主的人格特征研究——基于心理传记学方法的应用. *心理科学*, 37(4), 783-789.
- 吴善中. (2010). 洪秀全的家庭生活及其影响.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5), 85-89.
- 吴善中. (2010). 洪秀全的家庭生活及其影响.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4(5), 85-89.
- 夏春涛. (1992). *太平天国宗教*.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夏春涛. (2000). 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历史研究*, (2), 162-181.
- 夏春涛. (2000). 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散论.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 54-58.
- 夏春涛. (2003). 太平天军中的婚姻状况与两性关系探析. *近代史研究*, (1), 5-37.
- 夏春涛. (2004). 太平天国妇女地位问题再研究. *清史研究*, (2), 98-108.
- 夏春涛. (2006). *天国的陨落: 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夏春涛. (2012). 太平天国筹饷问题及其对战局的影响.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6(2), 89-96.
- 谢介鹤. (1952). 金陵癸甲纪事略.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徐修宜. (2005). 中西文化融合与洪秀全反清思想的形成. *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 (6), 98-96.
- 颜世安. (1988). 老子的政治方略和帝王人格说. *社会科学辑刊*, (6), 70-72.
- 杨小艳. (2006). 论阿德勒补偿理论对个体适应环境的指导意义. *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4(3), 75-77.
- 杨秀清. (1952). 建天京于金陵论.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杨玉荣. (2004). 洪秀全的科举情结析. *鄂州大学学报*, 11(2), 58-61.
- 余冬林. (2001). 试析洪秀全早期的思想历程. *鄂州大学学报*, 8(2), 68-72.
- 庾裕良, 陈仁华. (1989). *广西会党资料汇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 曾捷英, 周新林. (1992). 阿德勒合作教育理论简述. *比较教育研究*, (2), 46-48.

- 展明峰, 陈勇. (2004). 政治人格新论. *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 25-28.
- 张德坚. (1952) 贼情汇纂.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张宏杰. (2005). 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之三——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洪秀全. *社会科学论坛*, 6, 017.
- 张宏杰. (2005). 心不在焉的革命者: 洪秀全. *社会科学论坛*, (6), 133-143.
- 张杰. (1995). 天王洪秀全族册研究. *黑龙江民族丛刊*, 42(3), 52-58.
- 张平. (2004). 国外政治心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心理科学*, 27(6), 1467-1469.
- 张汝南. (1952). 金陵省难记略.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赵璐, 乔志强. (2002). 试析洪秀全的自卑心理和性格特征. *西安联合大学学报*, 5(1), 73-76.
- 郑剑虹. (1997). *梁漱溟人格的心理传记学研究*. (Master's thesis, 西南大学).
-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1979). 李秀成自述. 见 中国历史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文书汇编*. 北京: 中华书局.
-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1952). 公证福音书.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1952). 太平诏书.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1952). 天朝田亩制度.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1952). 天父下凡诏书二. 见 中国历史学会(主编),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是学会济南分会. (1958). *山东近代史资料: 1 卷*. 山东: 山东人民出版社.
- 周宁, 刘将. (2008). 心理传记学探析. *五邑大学学报*, 10(1), 79-82.
- 朱东安. (1999). 太平天国与咸同政局. *近代史研究*, 2, 56-63.
- 祝传清. (2013). 过度补偿心理初探. *学理论*, (8), 49-50.

141 自怜的() 142 矛盾的() 143 缺德的() 144 暴躁的() 145 优柔的()
 146 文静的() 147 奴性的() 148 得意的() 149 寡欲的() 150 早熟的()
 151 客气的() 152 无情的() 153 下流的() 154 亲切的() 155 体贴的()
 156 深沉的() 157 创新的() 158 反抗的() 159 理智的() 160 欺人的()
 161 荒唐的() 162 寡言的() 163 力行的() 164 爱美的() 165 烦躁的()
 166 寡情的() 167 易变的() 168 虚荣的() 169 虚伪的() 170 糊涂的()
 171 无信的() 172 好色的() 173 悲观的() 174 奢侈的() 175 热情的()
 176 急躁的() 177 消沉的() 178 好问的() 179 失意的() 180 挑拨的()
 181 中庸的() 182 轻浮的() 183 呆板的() 184 纵欲的() 185 知趣的()
 186 整洁的() 187 马虎的() 188 鲁莽的() 189 落后的() 190 闲散的()
 191 殷勤的() 192 狡猾的() 193 讨厌的() 194 爱哭的() 195 堕落的()
 196 腐败的() 197 吝啬的() 198 欺骗的() 199 偏心的() 200 合作的()
 201 无礼的() 202 自卑的() 203 空谈的() 204 随俗的() 205 激动的()
 206 无能的() 207 嫉妒的() 208 独特的() 209 孤独的() 210 胆小的()
 211 振奋的() 212 浅薄的() 213 礼貌的() 214 含蓄的() 215 麻木的()
 216 敌对的() 217 庸俗的() 218 自私的() 219 唠叨的() 220 年轻的()
 221 固执的() 222 浮夸的() 223 疲沓的() 224 紧张的() 225 丑恶的()
 226 诡秘的() 227 冷漠的() 228 残酷的() 229 无助的() 230 迷信的()
 231 迟钝的() 232 古怪的() 233 唯我的() 234 浪漫的() 235 卑贱的()
 236 顽固的() 237 放任的() 238 刻薄的() 239 愚蠢的() 240 冒险的()
 241 献媚的() 242 粗心的() 243 软弱的() 244 妄想的() 245 摆阔的()
 246 凶狠的() 247 投机的() 248 诡辩的()

第二轮测试

您好，以下这些词语是根据上一轮所有人的测量结果选出来的，这些词语的平均得分都在 5 分以上。请您根据自己对洪秀全的认识，从 1~3 分对以下词语再次打分。1 分表示不同意，2 分表示不确定，3 分表示同意。如好胜的（ ），若打 1 分则表示“对洪秀全具有好胜的人格特征这一观点，表示不同意。”；若打 2 分则表示“对洪秀全具有好胜的人格特征这一观点，表示不确定。”；若打 3 分则表示“对洪秀全具有好胜的人格特征这一观点，表示同意。”

竞争的（ ） 上进的（ ） 奢侈的（ ） 坚强的（ ）
疯狂的（ ） 出众的（ ） 好胜的（ ） 机智的（ ）
反抗的（ ） 有为的（ ） 冒险的（ ） 开明的（ ）
能干的（ ） 糊涂的（ ） 腐败的（ ） 迷信的（ ）
细心的（ ） 虚伪的（ ） 残酷的（ ）